



真理报

第九期

2025年12月

马列毛主义将开辟通往革命的光辉道路！

热烈庆祝世
界无产阶级
的伟大导师
毛主席诞辰
132周年！



战无不胜
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
想万岁！



跟着毛泽东

世界一片红

劳动解放社，中国马列毛协会报刊编辑小组

特别鸣谢：法国人民之火主席：张同志

毛

主

席

语

录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目录



时事评述

- ★ 算法铁笼中的怒火 1-2
- ★ 纪念毛主席诞辰132周年 3-6
- ★ 起来！去把敌人的宫殿砸了！ 7-12
- ★ 28岁女教师婚礼自杀事件：对修正主义体制的 控诉与革命呐喊 13-16
- ★ 教育制度之殇与革命的呼唤 17-19

百家争鸣

- ★ 论共革阵 20-24

不周山下

- ★ 在2025年12月26日，庆祝菲律宾共产党成立第57周年！ 25-26

- ★ 民族民主阵线团体在马尼拉游行，纪念菲共成立57周年 27

历史文献

- ★ 雇佣劳动与资本（第一部分） 28-29

导师语录

26



算法铁笼中的怒火

2025年12月长沙外卖工人的集体抗争，并不是一场偶然的“情绪失控”，更不是资产阶级媒体和修正主义者所描述的“秩序摩擦”或“底层互害”。它之所以突然爆发、迅速扩散、在极短时间内形成高度集中的群体行动，正是因为这一冲突精准地击中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赤裸、最尖锐的矛盾点：无产阶级在生产关系中被系统性贬低为工具、被算法管理、被空间隔离、被剥夺尊严。当外卖骑手被要求下车、推行、绕路、等待，而业主与资本却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时间与空间的便利时，这并不是“管理问题”，而是阶级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直接显现。正如马克思同志所指出的，人们的一切社会冲突，归根到底都源于他们在物质生产中的地位差异；所谓规则、秩序与文明，不过是既定生产关系的外在表现而已。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揭示，资本并不是中立的物，而是一种支配关系。当这种支配关系在今天披上“平台”“算法”“灵活就业”的外衣时，修正主义者便迫不及待地宣布阶级已经消失、剥削已经被技术中和。但现实却以长沙外卖工人的方式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平台并没有让劳动者更自由，恰恰相反，它把劳动时间切割得更碎，把劳动节奏压缩得更紧，把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压迫得更窄。骑手看似可以“自由上线下线”，实则在评分系统、派单机制、罚款规则的多重挤压下，被迫以牺牲身体、尊严乃至生命为代价换取微薄收入。这正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异化劳动：劳动不再是人的自我实现，而是人成为劳动的附属品，成为资本增殖过程中的消耗材料。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沙外卖工人的抗争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它不是由某个政党、组织或“别有用心的人”策动的，而是从最直接、最粗粝的现实压迫中自然爆发的。这一点，恰恰印证了列宁同志在《怎么办？》中反复强调的判断：自发性斗争必然会出现，因为资本主义本身不断制造反抗的条件。骑手们并不需要阅读厚重的理论著作，就能明白自己被压迫、被羞辱、被剥削；他们也不需要复杂的组织动员，就会在共同处境中迅速集结。这种自发性本身，已经是对修正主义“阶级消失论”的致命反驳。

然而，列宁同样指出，自发性并不等于解放。没有革命理论和组织引导的斗争，往往会被局部化、情绪化，最终被国家机器与资本秩序所吸收或镇压。长沙事件中迅速到场的警力、随之而来的信息封锁、对“秩序”的反复强调，正是这一规律的现实呈现。国家并没有站在劳动者一边，也不可能站在劳动者一边。这一点，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早已说得再清楚不过：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暴力机关。当无产阶级的集体行动触碰到既有秩序的边界，国家机器就会立刻撕下“中立”的面具，用警棍、法规和沉默来恢复“稳定”。

修正主义者在这一刻通常会登场，劝告工人“理性”“合法”“循序渐进”，仿佛问题出在斗争方式，而不在剥削本身。但斯大林同志早已指出，修正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否认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把资本主义秩序描绘成可以无限修补的体系。要求长沙骑手“冷静下来”，实际上就是要求他们重新回到被支配的位置，继续忍受算法、平台与空间歧视的多重压迫。这种“理性”，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性的翻版；这种“秩序”，不过是旧剥削关系的延续。

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这一切并不陌生。毛主席反复强调，阶级斗争并不会因为制度名称的变化而自动消失，只要剥削关系仍然存在，矛盾就一定会以新的形式爆发。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决定了斗争必然在具体条件下展开；而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他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明，如果群众的实际困难得不到解决，任何政治口号都会失去意义。长沙外卖工人的怒火，正是群众在现实生活中被长期压迫、却始终得不到回应的必然结果。

因此，这场抗争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并不在于它发生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持续运转的条件下，类似的冲突迟早都会发生；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它如此清晰、如此赤裸地揭示了一个被刻意掩盖的事实：在算法、平台和所谓“现代化管理”的外衣之下，在高楼、写字楼和消费主义灯火之间，中国城市中正在迅速形成一支规模庞大、结构稳定、却被长期否认其阶级存在的新产业无产阶级。他们没有固定工位，却被固定在算法之中；他们看似“灵活就业”，却在时间、空间和生存节奏上被彻底锁死；他们不再被工厂围墙包围，却被评分系统、接单逻辑和罚款规则构成的无形铁笼所囚禁。他们的处境高度不稳定，他们的劳动高度强制，他们的尊严却被系统性地剥夺和消耗，而这一切，却被包装成“效率”“进步”“技术中立”的结果。

正是这一群体的存在，使得“和谐社会”“持续发展”“全民中产化”的叙事显得越来越苍白和脆弱。因为他们一旦以集体的方式显现出来，就会让整个社会感到本能的恐慌——不是因为他们的做了什么“过激的事”，而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既有秩序的控诉。他们让人们不得不直面一个被反复掩盖的现实：所谓的繁荣，是建立在大规模不稳定劳动之上的；所谓的秩序，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尊严为前提维持的；所谓的“中产”，不过是用来遮蔽阶级分化的一层意识形态薄膜。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那样，无产阶级并不是因为道德选择而走向斗争，更不是因为情绪失控而显得“激进”，而是因为现存制度中，他们被系统性地剥夺了一切，只剩下锁链本身。当一个阶级被压缩到这种境地时，斗争就不再是态度问题，而是生存本身的延伸。

长沙并不是终点，它甚至谈不上是高潮，它只是一个信号——一个已经被反复验证、却仍然被刻意忽视的信号。它告诉我们：阶级矛盾并没有被解决，只是被暂时推迟、分散和遮蔽；阶级斗争也从未消失，只是被压缩得更碎片化、更日常化、更“看不见”的形式之中。当这种压缩不断加剧，当劳动者的时间被进一步剥夺、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尊严被进一步贬值时，爆发就不再是一种选择，更不是“少数人的极端行为”，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必然结果。任何社会都无法无限期地在高压之下维持表面稳定，而不付出代价。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于这种抗争是否“过激”，也不在于它是否“合乎秩序”；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有人、是否存在一种力量，准备好把这种不可避免的怒火，从零散的、短暂的、被动的爆发，转化为有方向、有组织、有目标的阶级力量。如果没有这样的转化，那么类似长沙的事件还会一次次重演，被一次次镇压、一次次遗忘；而一旦这种转化开始发生，整个社会赖以维持稳定的意识形态结构，就将被迫面对它最不愿面对的现实——阶级问题，从来没有被解决，只是终于开始被看见。



纪念毛主席诞辰132周年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132周年。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他为中华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作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毛泽东思想的创造者，毛主席的革命实践和理论遗产至今仍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重温毛主席的光辉历史和思想，对于坚定马列毛主义立场、批判修正主义歪风、继续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功绩

毛泽东主席的一生，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紧密相连。他率领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旧中国百年屈辱的历史。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真正“站起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这场伟大的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命运，也极大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又带领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在极其艰难的起步条件下，中国很快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并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取得了重大工业化成就，奠定了现代工业体系的基础。毛主席还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捍卫新中国安全，打破超级大国的封锁，使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尊严和地位。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新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国前夕，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左右，文盲率高达80%；而到毛主席逝世时，文盲率已降至不足7%，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约30岁。全国人口从解放前的约4亿增长到7亿多，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显著改善。新中国结束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殖民势力，中国人民真正掌握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在毛主席时代，中国成功研制了“两弹一星”，成为核工业和航天领域的后起之秀，极大提高了国家的安全和国际威望。这一系列辉煌成就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就没有我们今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



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前进！

社会主义建设与毛泽东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

毛主席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光辉的毛泽东思想。其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主席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并非一个阶级斗争熄灭的和谐天堂，而是一个相当长的过渡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依然长期存在，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正如毛主席指出的：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继续革命的必要性：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仍需通过政治大革命来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防止社会主义退化变质。

毛主席以高度的历史警觉，屡次告诫全党要警惕党内出现修正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早在1957年，毛主席就把批判修正主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指出“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他总结了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惨痛教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著名号召。1963年，毛主席更是发出惊世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他严肃地提醒全党，这将是何等危险的前景！1964年，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鲜明地点出了潜伏在党内的主要危险。毛主席一再强调：“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更揭示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权的危险。毛主席倡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把继续革命的理论付诸实践的一次伟大创举，广泛发动群众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意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在毛主席晚年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他根据新的阶级斗争动向进一步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一科学论断明确点出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存在，表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也绝不能懈怠斗争。毛主席始终坚持把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我们党的首要任务。他一生中亲自领导了反对高岗饶漱石集团、反对彭德怀集团、粉碎刘少奇和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等一系列重大的路线斗争，每一次都是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坚决斗争。正因如此，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才能保持革命本色，使社会主义江山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和人民手中。

毛主席关于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保证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不变质。他反复教育我们：“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毛主席晚年还亲笔指出：“林彪一类如果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的远见卓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至今仍然是指导我们反修防修、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锐利思想武器。在毛主席逝世后的几十年里，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发生的变化，无不验证了毛主席当年的预言和教导的正确性。

毛主席逝世后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危害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这是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点。令人痛心的是，毛主席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迅速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从1976年10月的“怀仁堂政变”起，党的路线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虽然当时华国锋等一度打出坚持毛主席“既定方针”的口号，但很快，实质上的修正主义路线开始主导党和国家政策。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停止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转而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生产力和所谓“改革开放”上。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继续革命理论，把毛主席晚年的阶级斗争路线斥为“错误”。自此，中国共产党逐步抛弃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走上一条背离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资本主义复辟道路。

事实胜于雄辩。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领导人所推行的路线，正是毛主席当年所警告的修正主义上台、资产阶级上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走资派，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黑猫白猫论”（不管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要能发展生产力就是好猫）等一系列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理论，鼓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搞资本主义。邓小平公然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阶级斗争，声称“我们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这种言论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基本理论原则。可以说，邓小平集团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背叛，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彻底的反革命倒退和背叛行为。



在经济上，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所谓“市场化改革”为名，实则恢复和助长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国家逐步放弃对基本经济命脉的计划控制，大力推动私有化和商品经济。一方面，引入外国资本和技术，另一方面，默许和扶持国内新兴资产阶级的成长。农业人民公社被解散，亿万农民重新被抛入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不得不背井离乡成为廉价劳动力。城市里，国有企业改制造成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作为领导阶级的力量被瓦解。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福利领域全面商品化，导致许多贫困群众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曾经在毛主席时代得到基本保障的工农大众，在修正主义路线下又陷入新的剥削和贫富悬殊的陷阱。正如有评论指出的，在邓小平主导的“改革”中，中国重新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资本对劳动的残酷剥削以及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改革数十年后，一小撮人先富起来，而广大工农劳苦大众却承受着沉重的代价：新的资产阶级骄奢淫逸，工人农民则为生计奔波，再次被压在社会底层。这种现象难道不正是毛主席当年所竭力避免的“旧中国换汤不换药”吗？

在政治上，修正主义路线同样表现在对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背弃和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纵容。毛主席生前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加强而不能削弱，他告诫全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因为一旦放松专政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然而1976年以后，我们党逐渐抛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将其污名化为“左倾错误”。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路线实质是否定了政治上的阶级压迫斗争，将阶级矛盾掩盖于“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口号之下。当年党内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和革命群众遭到打击和边缘化，而曾被毛主席定义为走资派的官僚却纷纷平反复出，大权在握。更有甚者，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资本主义的政治腐败、官僚特权、金钱至上等现象死灰复燃，严重侵蚀了党的肌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这一切说明，毛主席去世后执政的中共领导实际上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导致资产阶级势力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东山再起。

必须明确指出：今日的中国共产党早已不是昔日坚定执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而是打着共产党招牌行资本主义之实的修正主义政党。从理论到实践，它都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正如当年中共中央机关报在批判“四人帮”文章中所警告的那样：“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而1976年以后的党领导集团，正是以“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为名公然篡改了毛主席的既定革命路线，其行为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这种修正主义背叛不仅葬送了毛主席亲手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成果，而且使我们党蜕变为一个徒具共产主义空壳而实际奉行资本主义路线的假共产党。正如国外马列主义者尖锐指出的：邓小平之流虽然还挂着共产党招牌，但实际上不过是“烂资产阶级政权的头子”。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与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无实质区别，中国共产党沦为统治新资产阶级利益的执政集团，这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巨大背叛和欺骗。

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毛主席当年的英明预见。文革中，毛主席曾反复强调“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十年浩劫”后中国出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局面：修正主义者篡权上台、无产阶级政党变质、社会主义江山颜色突变。这一惨痛事实再次验证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无产阶级不能保持清醒的政治警觉，一旦放松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专政，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如洪水猛兽般席卷而来。在毛主席逝世后的几十年中，我们党和国家所经历的道路曲折，正是因为背离了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向，被修正主义牵引向资本主义泥潭的结果。这为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必须坚持继续革命，防修反修，才能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成果。

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继续革命到底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32周年之际，我们不仅要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更要继承和发扬他的革命遗志，继续沿着马列毛主义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毛主席留给我们的最宝贵财富，不仅是新中国的宏伟基业，更有他关于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理论真谛。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依然在侵蚀工人阶级的利益，各种改良主义、机会主义论调企图让人民放弃斗争、自我麻醉。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尤其需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不断开展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势力的斗争。



首先，必须重申阶级斗争依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正如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绝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贫富悬殊、官僚腐败、社会不公等，究其根源都是阶级斗争的新反映。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新旧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为社会主义招牌的存在而自行化解。相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主导，新的资产阶级迅速形成并攫取大量社会财富，工农大众相对被剥夺和压迫。对此，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都应当提高警惕，决不能被所谓“发展经济”“全民小康”的表象所迷惑，而忘记了背后的尖锐阶级矛盾。我们要重新拾起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武器，把对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斗争放在首要位置，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反剥削反压迫问题，组织和发动工农群众开展新的阶级斗争高潮。

其次，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不动摇。毛主席早已为社会主义国家指明了道路：胜利夺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接下来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不断清除滋生资本主义和旧思想的土壤。继续革命的核心，是要不断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对党和国家内部走资派和官僚主义者阶级进行监督和批判，及时纠正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倾向，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历史经验表明，一旦放弃继续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内部就会孳生新的特权集团和剥削阶级，长此以往社会主义国家必然变质。我们要吸取苏联解体、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等沉痛教训，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继续革命路线。在现有条件下，这意味着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强化对资产阶级和资本势力的限制和打击；意味着在思想文化领域坚持斗私批修，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整个社会舆论和教育文化，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

再次，我们要坚决开展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和斗争。修正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最危险的敌人，比公开的反共势力更具欺骗性和危害性。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口头上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际上推行的是资产阶级的路线和政策。1976年后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就是修正主义作祟的结果。对此，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加以揭露和批判，让人民群众认清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和危害。要破除一切对修正主义路线的幻想，否定那种“资本主义也能救中国”的错误思想。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集团使党蜕化变质，背离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不彻底批判和清除修正主义的流毒，就不可能重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我们呼吁所有忠于马列毛主义的同志团结起来，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肃清邓小平一伙修正主义路线的遗毒，重新确立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指导地位。

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中，必须时刻警惕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他还说过：“世界上真正斗争性的共产党，只剩下中国共产党了”——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和嘱托。然而今天，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者背叛了毛主席，令共产党蜕化变色。这更加呼唤真正的共产党人行动起来，肩负起挽救党、挽救革命的历史责任。

让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密团结一切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和人民群众，高举马列毛主义的伟大红旗不动摇！让我们以毛主席为榜样，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勇敢地投入新的长征！当前的斗争或许异常艰巨复杂，但正如毛主席所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们要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斗争精神。我们坚信，只要牢牢依靠人民群众，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不懈地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一定能够迎来新的胜利。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同志们，让我们行动起来，彻底揭穿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真面目，奋起直追被篡改的革命路线！正如国际毛主义政党至今所坚持的那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旗帜决不能倒。我们要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将红色江山代代相传，直到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

结语：毛泽东主席虽然离开我们已有半个世纪，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他的伟大思想和革命实践，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和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武器。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32周年之际，我们郑重宣誓：决不辜负毛主席的重托，决不让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改变颜色！让我们坚定地站在马列毛主义的立场上，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团结起来，继续革命，争取更大的胜利！正如毛主席的《诗词》所写：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无限风光在险峰。”前进道路或许充满艰险，但胜利终将属于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让我们以此与同志们共勉，在新的历史征程上续写更辉煌的革命篇章。

起来！去把敌人的宫殿砸了！

抗议的起因和背景

2025年末，伊朗国内累积的经济与社会矛盾激化，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这场运动始于2025年12月下旬，当时伊朗经济陷入严重危机：通货膨胀率屡创新高，里亚尔急剧贬值，民生物资价格飞涨。据官方统计，2025年12月的年度通胀率达42.2%，食品价格同比上涨72%，医疗用品上涨50%。伊朗里亚尔对美元汇率在2025年末跌至1美元≈150万里亚尔的历史低点，意味着货币价值在数年内暴跌近40%。国际制裁和经济管理不善使这一危机雪上加霜：2025年9月联合国通过“回退机制”恢复对伊制裁，冻结伊朗海外资产、限制其武器交易，加剧了国家财政困难。同时，政府内部长期存在贪腐和财政纪律松弛的问题，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进一步推高物价。燃料短缺和能源基础设施崩溃导致频繁停电停气，甚至总统佩泽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不得不在公共场合为断电断气频发向民众致歉。

经济危机直接刺痛了小商贩、工薪阶层等各阶级群众的生计，引发普遍不满。很多中小商户因汇率暴跌无法给商品定价，进货渠道中断，被迫停业。民众生活水平断崖式下跌：超过八成伊朗人陷入贫困（即使按当局承认的数据，食品等基本生活品一年涨价四成以上）。有报道称，为应对食品涨价，穷苦工人被迫赊账买面包，肉类消费几乎减半。这使人民对执政当局的不满达到临界点。更令群众愤怒的是两极分化和政府的虚伪：尽管当局鼓吹“抵抗经济”，声称与帝国主义对抗，但据统计，伊朗已经跻身全球美元百万富翁人数排名第14位，政权背后的资本家阶层在制裁之下依然大发横财，受苦的是工人和穷人。种种金融丑闻曝光：权贵势力操纵庞氏骗局、侵吞国有资产，把庞大的国营部门当作私产肆意攫取利润，而不是为社会大众服务。执政的神权当局为了维持统治，不愿削减对权贵有利的开支，转而通过大印钞票来填补预算漏洞，引发更猛烈的通胀。2026年3月的下一年度预算被预计将削减对普通百姓的补贴，加重他们的负担。

除经济困境外，政治压迫和社会危机亦是抗议爆发的重要背景。近年来伊朗政府不断强化高压统治，对异议者大开杀戒。仅在2025年，官方执行死刑的人数比前一年翻了一倍，达到近40年来最高水平，被指意在以血腥手段恫吓人民。自2022年“妇女，生命，自由”运动（因22岁的玛莎·阿米尼之死引发的抗议）遭残酷镇压后，社会各界对当局的信任持续下降。2025年间，不同群体的零星抗议不断：例如5月卡车司机在阿巴斯港发动罢工，封锁公路港口，抗议低工资、高保险费及燃油涨价预期。然而，这些局部抗议均被政权以逮捕、枪杀等强力手段压制。当局还对国内少数民族地区采取高压措施。库尔德、俾路支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早在2022年抗议中就遭到严厉镇压，许多社区迄今仍处于军事管制般的状态。



当局一方面将国内经济困难和动荡归咎于“敌对势力煽动的分裂主义”，指责库尔德反对派等“境外势力”引发骚乱，借此为进一步武力镇压找借口；另一方面却无视各族人民长期遭受的经济边缘化和政治歧视，这些结构性压迫也是抗议背后的深层原因之一。总之，物价飞涨、腐败猖獗、失业加剧、环境资源危机（水荒、电荒）叠加政治高压，让伊斯兰共和国的合法性在群众心中濒临破产。许多伊朗青年和劳动群众认识到，“这个反动体制已把我们几代人的未来劫为人质，改革无路，只有革命才能改变现状”。

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对抗议前景产生影响。2025年年中伊朗与以色列曾爆发为期12天的军事冲突（“十二日战争”），美国也参与空袭伊朗核设施并定点清除伊朗军官。伊朗苦心经营的地区盟友遭重创：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和真主党在黎巴嫩受挫，使伊朗区域影响力大跌。这些事件暴露了当局对外所谓“反美反以斗争”的虚弱，打破了一些民众对政权“至少能抵御外侮”的幻想。在内忧外患交织下，2025年底群众的不满终于从沉默转变为怒火，全国性起义一触即发。

抗议者的阶级构成与主要诉求

本轮抗议堪称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规模最大、参与阶层最广的一次全国性起义。抗议人群横跨城市小商贩、产业工人、大学生、妇女组织、少数民族社群乃至部分失业青年和退休人员等各个阶级阶层。运动初期的引爆点是巴扎商人的罢市行动：2025年12月28日，德黑兰电子商品集散地阿拉丁商城及恰尔苏购物中心的大批店主自发关闭商铺，上街抗议里亚尔暴跌带来的生存危机。随后，德黑兰大巴扎（传统市场）众多铺面在12月29日一早停止营业，以示声援。这些“小资产阶级”商贩长期被视为伊斯兰共和国的社会基础之一，如今却因为不堪经济崩溃而与政府决裂。伊朗国际电视台评论称，此次运动标志着巴扎里阶层与政权历史性决裂：当局强令商人按政府指导价销售且库存难以继，又计划在新预算中向小业者大幅加税，引发了巴扎里的强烈愤怒。商人们的主要诉求包括：稳定汇率、降低物价、营造可预期的经商环境，避免在汇率剧烈波动中破产。抗议之初这些诉求主要聚焦于经济民生层面，抗议口号如“不要看客，全体上街！”此类动员标语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人们还呼喊“警察同志，请支持我们！”，试图争取基层军警站在人民一边。

随着运动扩大，工人阶级和学生开始发挥更突出的作用。独立工会和行业组织公开声援抗议，包括卡车司机工会、全国教师协会、赫夫塔佩甘蔗工人联合会等。各地产业工人酝酿罢工，与街头运动相呼应。一些观察家指出，2018年以来伊朗多次起义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正是缺乏产业工人这一革命主力的深入参与。而这一次，工人阶级的介入比以往更积极。据报道，自发和有组织的罢工在各主要城市蔓延：商店、工厂停工闭市，甚至网络卖家、社交媒体网红也参与“线上罢市”，暂停日常运营以示抗议。到2026年1月上旬，全国至少20座大中城市发生了抗议和罢工。示威者的口号也从单一的经济诉求演变为明确的政治诉求。随着通货膨胀引发的绝望转化为对体制的不满，游行人群开始高喊“死神（哈梅内伊），下台去吧！”、“这47年来从未改变，现在是革命的时候！”等口号，直接将矛头对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整个神权体制。学生群体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德黑兰和其他城市数十所大学里，学生举行集会、发表宣言，明确表示对任何改良幻想的不信任：“这个犯罪政权劫持我们的未来长达47年，绝非改革或虚假承诺所能改变”。由此可见，当代伊朗的青年一代——尤其是所谓“Z世代”——对神权当局彻底失去了耐心，他们要求彻底的体制更替而非温和改良。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和少数民族群体在抗议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尽管2022年的运动以年轻女性为主要推动者之一，这次运动中青年男性参与更为踊跃；但是女性并未缺席，且继续以富有创造性的方式表达抗议。例如，众多伊朗女性将哈梅内伊肖像作为“烟灰缸”——点燃香烟烫烧最高领袖的照片，并把这些影像上传网络，公然挑战政权偶像崇拜和对于女性生活方式的管制。这一行为迅速引发病毒式传播，被解读为女性对国家父权和宗教强制的公开反抗。此外，库尔德人、俾路支人等边缘民族地区也发生大规模示威，并响应全国性的罢工号召。库尔德反对党（如伊朗库尔德斯坦科马拉党）联同其他六个库尔德组织，公开呼吁库尔德地区总罢工以声援全国抗争。俾路支武装团体甚至宣布结成“人民斗士阵线”等联盟，表示各族人民必须团结对抗什叶教士专政。这表明，本次运动已得到各族裔、各阶层人民的普遍同情，他们共享对贫困和独裁的愤懑。在诉求方面，除了经济改善和结束腐败，越来越多抗议者直言要求结束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一些派别呼吁由流亡的巴列维王储领导过渡政府并举行全民公投决定国家未来；但也有激进的革命青年提出“所有暴君都去死，不论国王还是领袖！”的口号，表明他们既反对现政权，也警惕旧王朝或外国势力乘乱复辟。总体而言，抗议者的核心诉求已从“面包与自由”进一步上升到争取民主权利和政治解放。这场运动具备明显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它不再满足于零碎改良，而是要求推翻造成压迫贫困的反动统治。

抗争方式与组织形式

2025年12月29日，德黑兰一处巴扎的商铺集体关门罢市抗议，抗议者聚集在店外街头示威。



此次伊朗全国抗议在斗争方式上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包括和平集会、罢工罢市、街头示威甚至一定程度的暴力对抗。起初，抗议以和平经济罢工为主：商人关门停业、工人罢工停产，使日常经济活动陷入停顿，以此向统治者施压。这种大规模消极抵抗策略在1979年革命中曾发挥关键作用，如今再度成为群众斗争的重要一环。2025年12月28-30日期间，抗议总体是克制而和平的。许多城市的示威者在集市、大学周边集结，高喊口号但未主动攻击设施。例如，12月28日阿拉丁商城的抗议者没有与安全部队冲突，示威保持和平。12月29日起，德黑兰大巴扎等地游行人群高喊“自由！”

（Azadi）等口号表达诉求。面对人群，一开始安全部队只是出动催泪瓦斯驱散，并未立即全面开火。但随着运动扩散，政府开始以软硬两手应对：一方面宣称“理解民众经济诉求，可对话解决”，另一方面却逐步加强武力镇压。



进入2026年1月后，抗争方式出现了升级和组织化倾向。一些抗议活动从纯粹经济口号转为直接针对政权的政治反抗，部分场合伴随攻击官方象征的行为。例如，在克尔曼沙阿省，有抗议群众拉倒了前圣城旅指挥官苏莱马尼的塑像，并将其砸毁。在马什哈德，愤怒的青年扯下悬挂在公共场所的巨幅伊斯兰共和国国旗，当场撕碎。德黑兰等地也出现了烧毁政权象征的事件：如抗议者纵火烧毁国营电视台(IRIB)在伊斯法罕的办公室，以及德黑兰的一些清真寺建筑。这些举动表明部分群众的愤怒情绪已难以被和平游行完全容纳，他们开始以革命破坏的方式发泄对当局的不满。

除了自发行动外，抗议中隐现一定程度的组织网络。尽管运动并无统一的公开领导，但境内外反对派人物和组织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试图引导局势。流亡海外的王室继承人礼萨·巴列维多次发布视频讲话，呼吁全国同步行动：例如他号召民众在1月8日晚8点统一喊口号，保持示威“纪律性和规模”，并扬言将视响应情况发布下一步动员令。库尔德左翼党派（如科马拉）则在1月初联络号召全国总罢工，并得到多个库尔德组织的联署支持。与此同时，一些地下青年团体、学生组织以及职业团体（如教师工会）纷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政府暴力并声援抗争。

可见，运动虽然表面上缺乏统一领袖，但网络时代的分散组织架构正在形成：各地抗议者透过互联网（尤其是在断网前的窗口期）进行信息交换和行动协调。这种去中心化的组织形式提高了运动的韧性，使当局难以通过逮捕少数头目来瓦解整个抗争。

必须指出，当局的高压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了武装对抗的苗头。随着镇压升级，一些民众为了自卫或报复开始采取暴力手段。官方媒体报道，在西部小城马莱克沙希，有“武装抗议者”试图冲击警察局，引发交火，造成1名安保人员和2名示威者丧生。人权组织也证实，在克尔曼沙阿等地的示威中，少数抗议者携带自制武器与安全部队发生激烈冲突。库尔德和俾路支反政府武装亦趁机对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发动袭击：2025年12月10日，俾路支武装的“人民斗士阵线”袭击了锡斯坦-俾路支斯坦境内一处革命卫队基地，打死4名士兵，并于次日发表声明宣称对此负责。2026年1月7日，该组织的成员还在伊朗沙赫尔刺杀了一名警察局长。据IRGC自述，在洛雷斯坦、克尔曼沙阿等地有数名安全人员被示威者打死，包括一起抗议者持刀刺杀警官的事件。有报道提到，部分军警人员出现叛逃或拒绝向人民开火的情况，甚至传出零星士兵倒戈加入示威行列的消息。虽然这些武装反抗和军队裂变的现象目前规模有限，但对于政权来说是极为危险的信号。一旦镇压再激化，不排除抗议演变为更广泛的人民武装起义的可能性。

政府镇压手段、反革命宣传及其效果

面对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统治危机，伊朗当局迅速祭出一套高强度镇压与宣传并举的策略，试图扑灭革命火焰。在镇压手段上，统治集团几乎不择手段地动用国内外可用的镇压力量。从抗议爆发伊始，安全部队就在关键城市重兵部署，包括大批防暴警察、巴斯民兵和革命卫队部队进驻德黑兰、马什哈德等地街头。互联网和通信中断是当局的标准动作：1月8日起，全国大范围切断互联网接入和电话服务，以隔绝各地抗议者的联系。政府此举意图阻止消息传播和民众进一步集结，被联合国谴责为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即便如此，一些抗议者通过卫星网络（如Starlink）等技术手段突破封锁，将国内实况传向世界。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1月3日公开下令对示威者“毫不留情、立刻镇压”。军警据此奉行“实弹驱散”政策，大规模向示威人群开枪射击。据报道，哈梅内伊直接授意安全部队可以对抗议者实弹射杀，导致多地出现屠杀事件。国际媒体和人权组织统计，短短两周内抗议死亡人数已达千人级别。伊朗人权组织(HRANA)等统计在1月8日前后，仅48小时内全国就有至少2000名示威者被杀。据激进媒体报道，死亡总人数可能在1.2万至2万之间。例如，CBS新闻援引反对派消息称超过一万二千名抗议民众被屠杀；《星期日泰晤士报》估计总死亡人数在16,500-18,000之间。即使按照伊朗政府内部泄露的数字，也有逾5000人丧生。如此规模的流血镇压，堪称当代伊朗史上最大规模的大屠杀之一。除了死亡，更多的人被打伤和逮捕：据《星期日泰晤士报》估计，受伤人数高达30-36万，被捕者至少2.4万人。各大城市医院涌入大批枪伤患者，一些医院停尸房据称“堆满了遇难者遗体”。由于当局切断通信，这些数字难以精确核实，但血腥程度可见一斑。

为加强镇压力度，伊朗政权不惜引入外部镇压力量。可靠消息指出，当局从周边盟友调集了大约5000名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进入伊朗，帮助对付抗议人群。这些外籍武装包括真主党、哈希德民兵等在中东地区臭名昭著的武装，由于本身不直接面对伊朗人民，有可能更愿意执行大规模射杀的命令。伊朗政府甚至还组织了一些支持政府的群众（主要是体制既得利益者和受洗脑民众）上街，企图以“以民攻民”。据报道，当局在德黑兰动员了数以万计的保守派支持者游行，高喊效忠口号，以制造“人民反对动乱”的假象。但这些所谓“反抗议游行”多数不得人心，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僚组织的政治秀，无法掩盖全国范围的反对声音。

在宣传策略方面，政权从一开始就试图将群众运动污名化和分化瓦解。一贯的话术是指责抗议为“外国敌对势力策动的暴乱”。哈梅内伊在电视讲话中称美国和以色列是幕后黑手，把抗议民众斥为“危害国家的暴徒”。他警告不会向“傲慢的特朗普”屈服，

把特朗普称作“手上沾满伊朗人鲜血的狂妄之徒”，妄图以民族主义仇外情绪来动员死忠支持者。官方媒体铺天盖地宣传，称大多数抗议者是受境外情报机构操纵的“暴恐分子”，而真正关心经济问题的市民已在政府安抚下退场，剩下的是“捣乱分子”。当局一边假称愿与“和平抗议者”对话，一边宣称对“暴徒”绝不手软，以此在舆论上区分善恶，为镇压正名。此外，政权控制的媒体开始大量播放被捕示威者的“电视认罪”录像。在抗议开始仅一周内，就有至少15段遭逮捕抗议者被迫认罪的视频在官方频道播出。到1月7日，被迫录像“忏悔”的抗议者已多达40人。显然，当局意图通过这种公开羞辱与恐吓相结合的办法，打击抗议者士气并吓阻他人加入。然而，大批艺术界和教师界人士却发表声明，揭露这种酷刑逼供的“认罪秀”毫无公信力，并声援争取自由的示威人群。

值得关注的是，政府的高压宣传在一定程度上适得其反。据人权团体HRANA分析，即使在酷刑、枪击的威胁下，许多伊朗人仍认为沉默的代价高于抗争的代价，因而冒死继续走上街头。社会各界（包括专业人士和文化名人）的同情态度也表明，政权妖魔化抗议者的叙事正在破产，越来越多“沉默的大多数”开始认同抗议运动的正当性。当局的强力弹压虽然造成巨大伤亡，但并未迅速平息动荡。到1月中旬，全国31个省都有群众上街，抗议持续两周仍未消退。当局虽然在部分地区（尤其德黑兰核心地带）以屠杀形成震慑，但在边远省份却出现统治力丧失的迹象——有报道称，伊朗库尔德斯坦西部的阿布达南、马莱克沙希两座城市一度被抗议者实际控制，政府军警被迫撤离。面对焦头烂额的局势，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裂痕。据《纽约时报》报道，伊朗高官私下承认政府正处于“生存模式”，对于经济困局和外部军事威胁均束手无策。总统佩泽什基安召集紧急会议，有幕僚甚至建议他公开谴责哈梅内伊在此次危机中的角色，以求自保。统治集团的分化再次说明，尽管镇压暂时压制了一部分抗议，但人民反抗的烈火并未被扑灭。革命者正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准备抓住有利时机推进斗争。



国际反应：帝国主义与反动政权的态度

伊朗这场大规模起义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介入，各方反应从声援到干涉不一而足。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普遍对伊朗当局的暴行表示谴责，但其动机复杂。一方面，西方媒体纷纷报道伊朗抗议，揭露政府的血腥镇压和人权侵犯。《经济学人》等刊物将此次示威称为“伊朗200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甚至可能媲美1979年革命，暗示伊斯兰共和国岌岌可危。欧洲联盟公开敦促伊朗当局“克制”，要求尊重言论和集会自由，并呼吁释放被捕的和平示威者。欧盟对德黑兰断网、射杀平民的行为表达“极度关切”，表示与伊朗人民站在一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更直接谴责暴力镇压，敦促伊朗尽快恢复互联网，称欧洲“完全支持勇敢的示威者”。联合国方面，秘书长办公室和人权机构谴责伊朗切断网络、剥夺公民自由，批评安全部队对平民滥用致命武力。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等非政府组织则收集证据，揭露伊朗当局“无差别杀戮和大规模抓捕”的罪行。国际舆论的这些声音客观上起到了声援伊朗人民的效果，为抗议者提供了道义支持和精神鼓舞。另一方面，美国及其盟友对伊朗局势的反应更具干涉色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26年1月明确站到抗议者一边（值得注意的是，若按照此情形推断，特朗普可能已在2024年重新当选美国总统）。他高调警告伊朗当局“不要再射杀抗议者，否则美国已枕戈待旦，准备采取行动”。特朗普放话称美军“已上膛待发，随时准备拯救伊朗人民”，并在社交媒体上称赞伊朗人是“勇敢的人民”。这些言论被伊朗政权利用来证明“外敌干涉”，但对于一些期待西方支援的伊朗反对派来说，却是鼓舞信号。以色列更是公开卷入：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官方法语账号在网上用波斯语发帖，“号召伊朗人民上街”，声称“我们与你们在一起，不只是口头上，而且在现场也在一起”。同时，有媒体披露以色列政府正幕后扶植伊朗流亡的君主派势力。以色列《国土报》的调查揭示，礼萨·巴列维所领导的君主派获得了以色列的支持，以色列方面甚至帮助制造假视频，在抗议现场播撒支持王室复辟的口号。美以阵营如此积极地插手伊朗事务，说明帝国主义势力希望趁此机会颠覆当前政权，扶植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傀儡。然而，正如一些左翼评论所指出的：如果无产阶级不掌握领导权，伊朗政权即便垮台，也可能被亲美傀儡所取代。因此，帝国主义的“支持”对真正的革命运动来说是一把双刃剑，革命者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中东地区的反动阿拉伯政权对伊朗动荡的表态普遍谨慎。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君主国近年来与伊朗关系有所缓和，对此次抗议多保持沉默或官方语言的呼吁克制，避免公开刺激德黑兰。当局控制的中东媒体有的选择低调报道，有的则幸灾乐祸地渲染伊朗政权风雨飘摇。但总体而言，周边各国政府出于自身统治利益，既希望伊朗对手削弱，又担心革命火种蔓延。例如，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对库尔德地区的抗议尤其关注，密切监视库尔德反叛武装动向，以防其跨境活动。

巴基斯坦官方则担忧俾路支武装斗争借机坐大，强调支持伊朗“维护稳定”。在伊朗的盟友阵营中，少数尚存的地区盟友如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政府、黎巴嫩什叶派政党等，对德黑兰表达同情，指责“外部势力煽动伊朗内部动乱”，但实际能给予的支援有限。更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的立场：由于与伊朗有地缘和经济联系，这些国家官方媒体对抗议报道十分克制，一面表示这是伊朗内政、一面继续推动与伊朗的合作项目。英国保守党领袖巴德诺克甚至公开表示“不反对政权更迭”，并支持美英直接介入，她声称伊朗政权对英国构成威胁，渲染有必要考虑更加强硬的行动。这类言论预示西方右翼势力可能推动更加激烈的干预措施，包括加大经济制裁乃至军事行动的威胁。总之，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各怀心思：他们口头上站在人权一边，但更深层的是想借机改造伊朗政权朝对己有利的方向。而真正关心伊朗人民解放的革命者，既要善于利用国际舆论同情，又要防止斗争被帝国主义所利用。

修正主义政策与资本主义复辟的矛盾体现

透过这场震撼伊朗的群众起义，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复辟所造成的深重祸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自称1979年革命的继承者，打着“反帝”

“革命”的旗号执政已近半个世纪。然而，其统治实践证明，它并未走上真正服务人民的社会主义道路，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背叛了当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诉求，逐步蜕化为一个压榨人民的官僚资本主义政权。这一演变过程，与马克思主义者在其他国家观察到的“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现象有诸多相似之处。

首先，经济领域的基本矛盾——生产与分配的矛盾充分暴露。伊朗当前的贫富两极分化正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直接产物。当局口口声声“伊斯兰平等”“圣教公正”，实则奉行官商勾结的权贵资本主义。大量财富集中在神权精英和其附庸资本家手中，据报道伊朗富豪阶层人数之多跻身世界前列，而底层劳动人民却陷入买不起面包、交不起房租的境地。这与当年革命群众对社会正义的向往背道而驰。政权将国有部门当作私产，统治阶层通过腐败和特权侵吞国有资产，导致经济畸形发展。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术语中，就是资产阶级重新上台。通过私有化和放任市场投机，伊朗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包括革命卫队经济寡头和宗教基金会商业帝国），而工人和小民却重新被剥削和边缘化。官方虽然没有完全放弃福利政策，但正如马克思主义所预见的，在资本利益驱动下，最终还是要砍掉补贴、转嫁危机给群众。2025年底的预算增税和减少补贴计划，就是这一趋势的体现，也直接激化了群众愤怒。



可以说，通胀、失业、贫穷等经济苦难，是资本主义道路的苦果。这正是修正主义路线（高呼革命，实则维护剥削关系）的必然后果。正如革命群众的口号所揭示：

“我们的生命不要再为加沙或黎巴嫩（外援）牺牲，只愿为伊朗生存而战！”——当政权醉心地区扩张和意识形态输出，却无视国内民生，这种现象也折射出官僚资产阶级以民族主义掩盖剥削的修正主义实质。

其次，在政治上，阶级专政性质的蜕变是矛盾的根源。伊朗1979年推翻美帝傀儡国王后，本应建立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体制，然而政权迅速滑向神权专制，将政教合一的教士阶层利益置于工农大众之上。这导致国家机器从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专政，异化为对劳动人民和进步青年的专政。修正主义的典型特征——镇压革命群众、打击左翼力量——在伊朗早有前科：上世纪80年代，伊朗共产党（图德党）等革命组织遭取缔，大批共产主义者被处决，即是一起惨痛的教训。如今，当局高压镇压女权、工人维权、少数民族自治等正义诉求，也是对人民民主的背叛和篡夺。有人说伊朗政权内部有“改革派”和“强硬派”之分，但事实证明无论保守还是温和派，皆维护既得利益，缺乏真正改革诚意。佩泽什基安总统以温和面目上台，却无力触动安全部门，任由屠杀发生，就是明证。革命群众已看穿这一点：大学生高喊“不相信虚假改革承诺”，宣告伊朗统治集团整体失去民心。这反映的正是人民大众对修正主义路线的绝望，他们用行动表明只能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整个反动统治阶级，而不能对统治阶级内部改良派抱幻想。

最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也说明了修正主义破产。伊朗当局当年打出宗教反帝旗号，但执政后渐渐以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取代最初的宗教狂热，以弥补合法性缺失。当连“圣战”叙事都无法凝聚人心时，他们改走世俗民族主义路线，鼓吹“国家安全”“抵御外敌”。然而这种宣传如今也陷入困境：女性不再畏惧道德警察，公然摘掉头巾挑战宗教禁令，当局甚至一度被迫暂停强制头巾法规以免激起民变。这表明，旧有的意识形态统治工具失效了。人民不再信神权主义那一套，也不买“西方阴谋论”的账。哈梅内伊为首的神权集团实际上陷入了信用破产，只能赤裸裸地依靠刺刀维持。有情报称，哈梅内伊甚至准备了逃往莫斯科的后路，随时准备在军队倒戈时弃国而逃——这无疑坐实了其“革命导师”形象的破灭。在意识形态阵地上，真理已不在反动派一边：越来越多伊朗群众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包括社会主义、女权、少数民族自决等观念。一位伊朗社会学者指出，当前抗议反映的是社会与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之间愈发深刻的裂痕。这种裂痕正是几十年资本主义复辟和虚伪宗教治国造成的，它孕育着新的革命意识的萌芽。

综上所述，2025年底至2026年初伊朗抗议运动，从马列毛主义观点看，是阶级矛盾大爆发的结果，集中体现了修正主义统治路线的全面破产和资本主义复辟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经济上，权贵资本坐大、民生凋敝；政治上，人民民主缺失、暴政横行；意识形态上，虚假叙事破产、革命觉悟觉醒。这些矛盾汇聚成摧毁旧制度的巨大能量。伊朗工人阶级、劳动妇女、被压迫民族、进步青年已在烈火中锻炼，在斗争中日益认识到只有打碎现行反动国家机器，建立真正属于人民的新政权，才能实现自身解放。国际马列毛主义者密切关注并声援这一斗争，同时警惕西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试图利用人民的不满攫取胜果。展望未来，伊朗的革命前景依赖于建立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核心，将分散的怒火凝聚为有组织的力量，夺取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重演。当前的斗争已经证明：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伊朗千百万被压迫人民有决心也有能力推翻早已腐朽透顶的反动统治。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要高举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红旗，总结教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着推翻伊斯兰共和国、建立社会主义伊朗的目标奋勇前进！



28岁女教师婚礼自杀事件：对修正主义体制的控诉与革命呐喊

悲剧背后的体制压迫与阶级剥削 2025年12月，河南鲁山县28岁的高中历史女教师魏亚蕊在新婚当天跳楼自杀。这起震惊全国的悲剧绝非孤立的意外，而是制度性压迫的血泪见证。魏亚蕊老师生前在朋友圈留下长篇遗言，控诉自己被父母亲戚逼婚长达七年，认清了“（在父母眼里）我自己最大的价值就是结婚……我完成了我这辈子最大的任务”。字字句句，揭示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体面职业的女性，被家庭和社会牢牢困在旧式枷锁中的绝望现实：在父母亲戚眼中，她作为女儿的人生价值被异化为交换婚姻的商品。为了逼她就范，父母甚至不惜以死相逼，亲戚骂她不孝，未婚夫对她百般羞辱。她从大学起抗争了11年，到头来却只能含泪顺从，“完成”了自己作为女儿的所谓任务。这正是当代中国一种怪诞现实：一名现代女性竟仍被束缚在类似“旧中国”的宗法罗网中。这种悲剧决非个人的不幸，而是制度暴力的产物。婚礼当天，魏亚蕊没有披上婚纱，而是身着便装随父母登上婚车。她在婆家新房借故将门反锁，从7楼纵身一跃，用生命进行了最沉痛的抗争。更令人发指的是，她逝去后娘家和婆家相互推诿，不肯认领遗体：娘家说女儿已出嫁，婆家说新娘未过门，遗体在现场停放一天无人过问。双方甚至为退还“彩礼”发生争执，把她的尸体也视作一件“损毁的商品”，互相推卸处理这件“不良资产”的责任！在这金钱至上的冷漠算计下，一个鲜活生命彻底沦为可以弃置的“物”。这残酷一幕揭示了封建残余和资本逻辑的狼狽为奸：女性被当作家庭经济单元中的筹码，一旦无法履行“交易”，便遭到遗弃和物化。事实上，魏亚蕊老师生前不仅要承受家庭的精神压榨，在工作中同样身陷职业环境的剥削和压迫。她曾以笔试、总分双第一考入公立高中任历史教师，在此之前还在私立学校辛勤耕耘两年。但即使进入体制内，她的处境依然艰辛：学校以升学成绩为导向，对教师进行严苛考核，她所带班级成绩落后时，就被领导多次叫去参加“批评会”挨训。尽管魏老师对学生温和体贴，从不因成绩责怪他们，换来的却是管理层无情的指责和羞辱。这种考试至上、绩效压迫的环境下，教师被迫把全部心血都压在学生分数上，却仍要承担校方的不公苛责。在现行教育制度下，教师群体普遍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表面上学校不公布学生排名，背地里却以成绩对教师排名；学生犯错老师不敢管，反过来校长却可以以成绩为由批评羞辱老师。教师不仅要应对繁重的教学任务，还要被迫承担学生成绩排名、家长满意度调查、职称评定等多重考核压力。对年轻的女教师而言，工作上的高压和家庭上的高压交织，更是难以喘息：一方面要完成学校业绩指标，另一方面还被催逼在黄金年龄前结婚生子。魏亚蕊在学校里兢兢业业，却屡遭批评；在家里孝顺懂事，却仍被当作“生育工具”来摆布。当双重压迫毫无止境地消磨她的意志，当她意识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逃不出既定的命运轨道时，这个善良温柔的女孩终于被逼上了绝路。



魏亚蕊老师以死抗争，不是因为她个人软弱无能，而是整个社会把她推向了绝境。这场悲剧揭露的是修正主义统治下体制性的压迫：家庭、学校、社会合谋将劳动女性逼入死胡同。她的死亡是对吃人制度的一记重锤警醒，也是埋藏于社会深处阶级矛盾的一次总爆发。正如评论所指出，这并非简单的“家庭伦理失败”，而是在国家—资本—家庭三角结构共同作用下的制度性产物。要真正为逝者讨回公道，我们必须深入剖析压迫她的体制根源，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来揭露这个悲剧背后的黑暗真相。教育体制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对教师的压迫要理解魏亚蕊之死的制度根源，首先必须审视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及其所奉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时代的教育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公益事业，而当今当局背弃了马列毛主义路线，把教育推上了资本逐利和官僚控制的歧途，即所谓“教育产业化”和教育官僚化。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带来的不是教育质量的提高，而是对教师和学生赤裸裸的压榨与摧残。在当代中国，再没有比“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更能生动体现当权精英如何借“改革”之名疯狂敛财、无耻践踏劳苦大众权益的例子了。教育本应保障人民的发展权，但资本与特权勾结，将学校变成逐利机器，把本应纯粹奉献的园丁职业逼成逐利的工具人。近年来教育经费投入巨大，可真正流向一线教师和学生的资源却日益紧缺；反倒是各级官僚层层盘剥，名目繁多的收费和摊派让家长 and 教师苦不堪言。“教育产业化”剥夺了贫困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断绝了他们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让他们永远沦为无知愚昧的苦力；同时也剥夺了教师体面的劳动条件和尊严。为了追求升学率和利益最大化，许多学校不惜以成绩定工资、以升学率定荣誉，逼得老师把学生当作生产线上的产品压榨，学生成绩好就是“宝贝”，差就是“废物”“渣滓”。这套异化的教育评价体系，将老师和学生一同卷入惨烈的竞争内卷，亲密的师生关系变成了冷冰冰的分数关系，教育的公益属性被彻底扭曲。更可悲的是，这种压力之下，教师和学生成为双重受害者。一方面，教师长期超负荷工作却待遇微薄，不少人被迫课外兼职谋生；另一方面，学生也被分数至上的扭曲理念摧残身心。

然而掌握话语权的资产阶级却把教育乱象的责任推给教师个人，甚至用末位淘汰等手段对教师进行残酷竞争淘汰。当温州一名小学女教师在教室自缢身亡时，舆论普遍怀疑她是因班级成绩不理想、多次受到校方批评或末位淘汰压力过大而走向极端。当地教育局却草草将此定性为“意外”，试图掩盖制度问题，引发公众更大愤怒。这种官僚作风只关心维护政绩与脸面，哪管教师的死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当局热衷于形象工程和数字政绩，却对教师实际处境的恶化冷漠以对。

在当前体制下，教育领域充斥着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和官僚主义的等级压迫：名校争抢生源、重点中学如同企业竞赛，教师被当作提高指标的机器，学生则被当作应试工厂的产品。这与社会主义教育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劳动者、服务社会的人民教师的宗旨背道而驰。特别是女教师群体，既承担繁重教学又面对社会偏见（如所谓“大龄未婚”的压力），更成为这套体制的牺牲品。魏亚蕊在遗言中提到：“你看我还得到了钱，以前我无论如何都得不到的钱，现在只要老实去结婚都有了。”这透露出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在资本和父权联手编织的陷阱中，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教师，要获得经济保障也被迫以婚姻交换自身价值。国家撤退公共福利、将养老、生育等风险推给家庭，再由家庭把压力以“为了你好”的名义转嫁给女性。当年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婚姻法曾废除了包办买卖婚姻，但今天，在资本主义私有制逻辑卷土重来之下，高价彩礼、逼婚买妻等封建残余变本加厉地复活了。而地方政府和学校对这些现象不是袖手旁观就是推波助澜：对农村重男轻女、买卖婚姻的问题听之任之，对教师承受的超负荷工作和婚育压力缺乏任何人文关怀。这正是修正主义统治的恶果：资本逐利本性和官僚冷漠作风结合起来，将教育变成逐利场，把教师学生都当作牺牲品。对魏亚蕊个人来说，她所遭遇的一切——家庭的逼婚、彩礼的交易、学校的苛责和歧视——都不是孤立的偶然，而是当今社会阶级压迫在教育领域和家庭领域的集中体现。当前中国的教育体制早已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被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所绑架。正如一位作者痛心疾首地指出：“如今不受监督的特权与贪婪野蛮的资本结合起来，疯狂、无耻地压榨人民；各种侵犯人民利益的异化改革被假以神圣的名义强加在人民头上。而教育产业化，正是这种异化改革的极端产物”。在这样的体制下，出现魏亚蕊式的悲剧并非偶然，而是早已埋下的地雷终将爆炸的必然。只有彻底清算这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还教育以公益和人民性的本质，才能避免更多老师和学生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揭穿网络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伪装在魏亚蕊事件引发社会震动后，互联网上也出现了各种解读和争论。其中不乏一些标榜“女权主义”的声音，将矛头单纯指向父权制和男性，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父权文化害死女性的悲剧。这种观点看似抓住了问题的一部分——父权思想确实在逼婚悲剧中扮演了恶劣角色——但如果脱离阶级剖析，只从性别对立出发，就难免流于片面和肤浅，甚至可能模糊真正的矛盾根源。我们必须警惕，当今中国网络上流行的许多所谓“女权”思潮，实际上是打着解放女性旗号的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其本质是去阶级化、精英化、脱离劳动妇女实际的伪解放。何谓资产阶级女权？简言之，就是在现有资本主义框架内为一部分女性争夺特权，而不触动整个社会的不公基础。这种女权主义希望在不改变私有制的前提下废除男权，对抗的是男性而非资本，追求的是让资产阶级女性享有和资产阶级男性同样的特权地位。它表面上反对父权制，实际上却不敢触及父权制背后的根基——私有制和阶级制度。它把女性和男性对立起来，鼓吹一种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私“平等”，而无视工人阶级女性和男性同样被资产阶级压迫的现实。试想，即使这种资产阶级女权所要求的目标都实现了，解放的也只是那一小撮有产阶级女性，而她们在家庭中仍可能作为妻子、母亲受到压迫；广大无产阶级女性呢？将会面对来自资产阶级的男性和女性双重压迫，陷于更深重的苦难之中。事实正是如此：当一些都会白领女性在职场上争得高位、名媛名流在社交媒体高谈阔论时，工厂里的女工、乡村的贫困妇女和基层的女教师依然在血汗工厂和家庭重担下苦苦挣扎。所谓“一起女性议题”，在阶级社会中根本是不存在的；不同阶级的女性命运迥异，利益冲突越来越尖锐。资产阶级女权鼓吹的“女性联合起来对抗男性”只会进一步割裂无产阶级队伍，让真正的压迫者——资产阶级坐收渔利。更有甚者，某些极端思潮已经演变为对男性群体的盲目仇恨，甚至鼓吹所谓“性别战争”。在网上，一些打着女权旗号的“KOL”炮制耸人听闻的言论，挑动两性对立，似乎仇恨一切男性就是女性解放的途径。这实际上堕落成了法西斯式的伪女权。正如左翼评论者指出的：每当无产阶级想要团结一致或看清社会问题根源时，资产阶级就会派出爪牙不惜一切代价分化无产阶级；而那些极端女权主义者正是通过鼓动性别矛盾来遮蔽阶级矛盾，

为资产阶级服务。这些人从不提及资本主义制度对妇女的剥削，从不敢引用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理论或提工人女性的革命传统，而只是沉溺于鼓吹男性原罪、渲染性别仇恨的陈词滥调。她们把旧社会男女不平等的一切罪过简单归咎于男性“天生压迫”，却对封建和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阶级不平等与性别不平等交织只字不提。这种去历史、去阶级的论调，看似激进实则反动：它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中男女并肩战斗取得的巨大成果，抹杀了无数革命先烈中女性的贡献。说到底，资产阶级女权只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特权而抛出的又一颗“烟雾弹”。它引导妇女把愤怒指向普通男性，同阶级兄弟相互仇视，却让真正的敌人——资本家和反动当权者——躲在幕后窃笑。

魏亚蕊老师的悲剧正说明，光是喊几句“反对父权压迫”的口号是不够的。有人或许会说：“她父母太封建”、“未婚夫是渣男”、“社会对女性太苛刻”。这些指责当然没错，但如果我们停留于此，就等于默认了解决方案只是让父母开明一点、男人温柔一些、女性自己更独立坚强一些。而现实是：在一个阶级严重分化、资本主宰一切的社会中，孤立的个体抗争往往无力改变命运。魏亚蕊这样温柔善良又奋发向上的女性，为什么抵抗了整整七年还是走向毁灭？因为在宗法家庭、父权文化和资本逻辑编织的天罗地网中，她被孤立无援地困住了！她的父母并非生来残忍，他们逼婚背后有自己深层的焦虑：农村养老无保障，希望女儿出嫁获得经济依靠，或者利用彩礼补贴家庭，等等。这些焦虑归根结底源自社会保障的缺失和贫富分化的扩大。换言之，在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当道的当今中国，是整个制度在鼓励和纵容对女性的压迫。资产阶级女权只会让我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看不到压在女性头上的“三座大山”：资本主义剥削、父权制残余和官僚专制。它更不会告诉我们，正是1970年代末以来资本主义因素的回潮，让原本应逐渐消亡的买卖婚姻、大龄歧视等重新猖獗。因此，对那些只顾网上喊口号却不触及社会根源的伪女权主义思潮，我们必须坚决予以揭露和批判。女性的真正解放，绝非争取几个精英女性的名誉地位，也绝非简单与男性对立所能实现；它需要的是推翻一切剥削制度、铲除压迫妇女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指出：“妇女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社会问题，其主因是经济原因”。不同阶级的女性有着根本不同的利益诉求。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妇女看重的是自身的阶级特权，她们追求的“平等”只是和资产阶级男人平起平坐，而无产阶级妇女追求的则是彻底铲除阶级压迫、实现全社会解放的平等。当代那些鼓吹“精英女性崛起”的思潮，从来不敢直面工厂里女工被超时加班压榨、农民工姐妹被欠薪欺凌、基层女教师被逼婚逼得寻死觅活的现实。这种脱离劳动人民的“精英女权”根本不是解放，而是对广大妇女的欺骗和背叛。我们绝不能让它在舆论场上一手遮天！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说：“任何一种企图只解决妇女的命运而不触动社会根基的做法，都是虚伪的和徒劳的。”（列宁语）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资产阶级的伪女权！妇女解放只有依靠无产阶级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

马克思主义指明女性解放的唯一道路 面对魏亚蕊之死所暴露的沉重现实，我们当如何自救？资产阶级女权为代表的改良主义道路是死胡同，那么出路究竟在哪里？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重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才是包括女性在内的一切劳苦大众摆脱压迫的唯一出路。马克思主义早就阐明，妇女的解放与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不可分割的。同处阶级社会的深重苦难中，劳动妇女绝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获得真正平等。正如国际妇女运动先驱蔡特金指出的：“妇女解放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代社会永远无法解决，只有在彻底的社会变革之后才能解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深刻分析了私有制与婚姻压迫妇女的关系，指出只有消灭私有制、进入无阶级社会，婚姻才能从商品契约变回真正的个人情感联合。毛主席也一贯强调：“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参加生产斗争和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妇女翻身作主成为半边天，包办买卖婚姻、纳妾缠足等封建压迫妇女的制度一扫而空。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胜利：只有改变了社会物质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妇女地位。然而，可悲的是，当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走上修正主义歧路，资本主义因素沉渣泛起，女性再度首当其冲地受到侵害。就业市场上出现了对女性的歧视，“退出职场回归家庭”的逆流令女性再次被推向附属地位；婚姻领域彩礼新高企、拐卖妇女案件频发，甚至发生震惊全国的“丰县铁链女”惨案。这些血的教训警示我们：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妇女的真正解放；背离了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女性权益将不可避免地严重倒退。当今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让妇女重新沦为商品：无论是底层妇女被人贩子明码标价买卖，还是高知女性被当作生育机器逼婚，归根结底都是私有制和阶级压迫的恶果。因此，只有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拔除资本和父权压迫的经济基础，才能还女性以真正的人身自主和人格尊严。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都已反复证明：妇女解放不可能单独实现，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才能实现。在旧社会，中国妇女被称为“半边天”下的黑暗。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妇女才从牛马般的地位一跃而成为建设国家的重要力量。只有当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公有，剥削阶级被消灭，才能为妇女摆脱附属地位创造根本条件。当社会不再将养老、医疗、教育的负担推给家庭，当每个人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像魏亚蕊这样女性所面临的家庭压力才能大大减轻；当就业和分配实现男女平等，女性不必为生存依附男性，也就没有父母逼婚、“宁愿给人做老婆也不要当老姑娘”这种观念的市场。可见，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才能同时解放女性和男性，让两性真正平等地作为人参与社会发展。今天，我们纪念魏亚蕊老师，并不仅仅是为一个逝去的生命哀悼，更重要的是从中汲取斗争的力量。她用牺牲向我们敲响警钟：在一个充满剥削和不公的制度下，个人的善良隐忍换不来尊重，



只有奋起革命才能砸碎枷锁！只有重新举起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发动人民群众推翻压在头上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妇女乃至全社会的真正解放才有可能。这绝非夸张的空想，而是被历史证明了真理：当年的中国妇女，正是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才扬眉吐气站了起来；而当资本主义势力卷土重来时，受苦受难的首先又是妇女。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沿着这唯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

团结起来，反对修正统治与教育商品化的斗争要将以上认识化为现实的变革力量，就必须付诸集体的行动。我们号召广大妇女姐妹们奋起，与工人阶级兄弟们、与一切被压迫的教师群体团结起来，结成牢不可破的革命统一战线。不要再被资产阶级的挑拨离间所迷惑，不要再将彼此当作仇敌——真正的敌人是压榨我们的剥削阶级和腐朽当权者！正如革命导师所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所有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工人阶级男性绝不是女性的天生对立面，而是同样受资本压迫的平等个体；广大男同胞也应当放下被资产阶级灌输的“大男子”偏见，认识到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重要一环，没有妇女解放就没有全人类的解放。在革命队伍中，男女谁也不是谁的附庸，更无谁离开谁就能单独胜利。一个只有男性的社会或只有女性的社会都是畸形不完整的；只有男女同志并肩作战，才能支撑起革命的天空，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当前斗争迫在眉睫的任务有两方面：一是反对修正主义统治，二是反对教育商品化。首先，反修正主义统治就是要揭露和抵制现当局背叛社会主义、与资本狼狽为奸的种种倒行逆施。魏亚蕊的不幸源自社会保障的缺位、封建陋习的回潮、教育的异化，而这些无不是修正主义路线导致的恶果。当局为资本保驾护航、对买卖婚姻等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包庇人口贩卖的罪行以维护所谓“稳定”。我们要戳穿他们的谎言和伪善，让更多人民认识到正是这个资产阶级专制政府成为拐卖妇女、强奸压迫的最后庇护所，是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最大的纵容者。没有这个反动政权的腐败无能 and 怙恶不悛，就没有魏亚蕊们的家破人亡！因此，推翻修正主义、打倒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实现一切社会正义的前提。其次，反对教育商品化则是我们工人教师学生共同的战斗。在教育领域，要坚决抵制和斗争当前以利润和分数为中心的资本逻辑，要求真正的教育公平和师生权利。



我们必须向一切祸国殃民的教育产业化措施宣战，“把它们和它们的鼓吹手一起踩在脚下，让它们烂在泥里！”教育不该是奢侈品，不该是权贵谋利的市场，而应是全民共享的公共事业；教师不是企业员工，学生不是生产工具，我们拒绝继续充当应试工厂里的螺丝钉！在这斗争道路上，我们呼吁广大教师们擦亮眼睛，认清自己的阶级身份。教师也是劳动者，和工人农民本质上没有区别，同样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那些体制内的特权寄生者并不代表我们，他们只是借教育敛财的既得利益集团。真正与我们利益一致的是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家庭——我们的学生和家 长中的工人、农民。魏亚蕊的不幸引发了无数普通群众的同情和愤怒，这正说明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我们要把这股民众的悲愤之情化为变革的力量，用马列毛主义的观 点去启发群众、组织群众。让妇女运动摆脱资产阶级的操控，回到劳动妇女和劳动人民自己的手中！今天，一切在斗争中觉醒的女性都应认识到：只反对男人不反对资本，只强调性别不谈阶级，是远远不够的，也是危险的歧途。我们必须明确，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于阶级压迫。只有和工人阶级紧密团结，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以及其根源私有制一同埋葬，妇女才能迎来彻底解放。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魏亚蕊老师未竟的意志。她倒下了，但成千上万的魏亚蕊正在醒来！封建和资本合谋造成的惨剧决不能再重演。我们誓要掀起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狂澜，把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资产阶级专制政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让工农兵学商各界劳动妇女和男子并肩战斗，重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当无产阶级重新掌握政权，当社会主义的红旗再次高高飘扬，我们才能告慰魏亚蕊那含恨而逝的英灵：旧世界的腐朽势力终于被埋葬，新中国的妇女再也不会被逼上绝路！妇女们，觉醒吧！工人同志们，行动起来！我们要高呼：打倒资产阶级，打倒一切剥削压迫！新社会必将迎来真正的男女平等和人间正道。让我们团结起来，投入这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用革命的烈火烧毁残忍的不公现状。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救自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妇女！历史的惨剧不能再重演，革命的旗帜必须由我们高高举起。让魏亚蕊的不幸成为激发千百万人民觉醒的号角，让新一代青年、妇女、工农群众都投入到反修反资的洪流中去。胜利终将属于无产阶级，属于全体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妇女解放万岁！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教育制度之殇与革命的呼唤

社会和制度背景：教育压迫、家庭压力与官僚冷漠 今年12月发生在广东省化州市一起学生坠楼悲剧震惊了众人。一名高中学生（殷梓辉）因班级晚自习纪律问题遭班主任集体惩罚，全班被迫留堂。他对这种不公表示质疑却遭无视，愤而自行离开教室。事后，班主任不但不反思自身做法，反而辱骂指责，说既然他擅自离开就“不用再来上课”，将其逐出课堂。在随后的日子里，该生被停课反省，一周后返校又遭到包括校领导在内的当众批评羞辱。在操场升旗仪式上，这位饱受折磨的青年从七楼撒下控诉老师的字条，随即纵身一跃，以生命对这种教育暴政作出了最惨烈的抗议。一个年轻生命就此凋零，校园上空回荡的是家长与同学无尽的悲痛和愤怒。这起事件并非偶然的个人悲剧，而是当今社会教育制度畸形发展的缩影。当前的学校早已背离了育人初衷，成为压迫学生的高压工厂。漫天的课业和考试让少年不堪重负，学校管理充斥着惩罚和纪律高压，被迫服从的学生毫无人权可言。许多教师不把学生当作活生生的人，而当作考试机器，对质疑和个性零容忍。这次化州事件中班主任粗暴处罚全班、辱骂质疑的学生，并在悲剧发生前对学生绝望呼声充耳不闻，就是这种权威压迫的极端表现。至于地方教育官僚，更体现了冷漠无情的一面——对校园内长期存在的体罚羞辱听之任之，在学生出事后第一反应往往是否认责任、封锁消息，而不是深刻检讨。不仅学校，家庭环境的沉重压力同样压垮着青少年。一方面，中国父母普遍抱持“望子成龙”的观念，将子女的学业成绩视为家庭荣耀和未来出路。这种期望往往异化为沉重的负担，逼迫孩子在激烈竞争中不敢有半点喘息。一些父母缺乏科学的教育观，一味用打骂和比较刺激孩子，把本应温暖的家庭变成第二个战场。当孩子成绩不理想或逆反时，来自父母的苛责、羞辱甚至暴力都可能发生。许多青少年长期在学校被压、回家还要被训，没有任何情感支持和理解，心理不堪重负，最终走上绝路。据报道，就在本月河南省也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悲剧：一名28岁的女教师因为不堪父母逼婚，在新婚当天跳楼身亡。她在留给朋友圈的遗言中控诉：“自己并不想结婚，是被父母和亲戚逼迫的”，直言父母把她的人生价值等同于结婚。这种父母的专制压力与学校的应试压迫如出一辙，都在将青少年推向绝望的深渊。更有甚者，地方官僚体系对教育乱象和学生疾苦的漠视助长了悲剧的发生。在一些地方学校里，官员和校领导只顾追求政绩和升学率，对校园内的压迫和问题装聋作哑。



正如网友对广东某校让学生签署“自杀免责声明书”事件的愤怒评论：“学校真冷血，根本不在乎学生的心理健康，也不在乎学生是死是活，只在乎自己的升学率和甩责任，恶心！不去反思到底为什么这么多自杀行为，不去帮助可能出危机的孩子，反而先把学校责任摘干净，这还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吗？”这种冷酷的话语，道出了当今许多学校和教育官僚的真实嘴脸。他们关心的只是数据和面子工程，面对学生的困境与生命却无动于衷。教育体制的压迫、家庭的高压逼迫、官僚的麻木不仁，这三重因素交织，构成了化州坠楼惨案的深层社会制度背景。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如何将学校变为竞争工厂 造成上述悲剧的根源，正是在于当前统治当局奉行的一条反动的教育路线。这条路线口口声声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实则早已背叛了无产阶级教育的宗旨，蜕变为赤裸裸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自号称“改革开放”以来，当权者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方针，把学校推向了市场竞争的泥潭。教育领域沦为了资本逐利和官僚政绩的竞技场，学校被异化成了批量生产考试机器的工厂。在这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指引下，应试教育大行其道。从小学到高中，学生被迫沉溺于无休止的题海战术，每天机械刷题，学习的唯一目的就是考高分、上名校。一切教育活动都围绕分数和升学率转，以至于很多高中自豪地自称“高考工厂”。正如人民日报旗下评论所批评的，那些所谓“高考工厂”式的学校严重异化了教育：一切以应试为核心任务，造成学生发展极端片面，甚至酿成自杀等无法挽回的悲剧。在这里，学生不被视为有思想、有创造力的人，而只是考试的齿轮；德育、体育、美育被统统抛弃，只剩下冷冰冰的分数挂帅。这种扭曲功利的办学理念，已经遭到有识之士的强烈批判。可以说，当今教育路线正在把我们的校园变成没有人性的竞争战场，在残酷的压力下，青年学生被逼得抑郁、崩溃，乃至以死抗争。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本质就是如此——它服务于资本和统治阶级利益，培养的是顺从的工具和奴仆，而不是真正全面发展的新人。批判教育学者早已指出：资本主义学校教育是一种异化的教育，知识被看作可以像商品一样由教师传递给学生，学生只需服从标准答案即可；学校采用工厂的流水线方式进行管理，标准化、一刀切，用分数来衡量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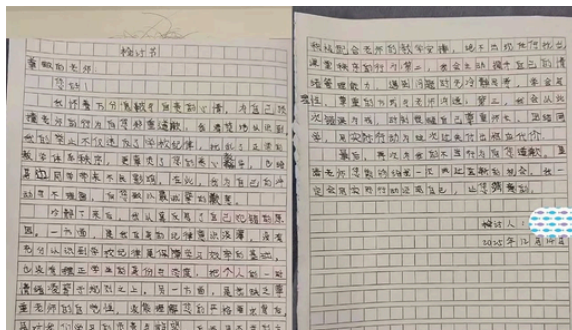
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青少年从小被灌输服从权威、竞争压倒一切的思想，人格被扭曲，创造力被扼杀。学校本应是培养独立人格和健全心灵的殿堂，如今却变成了扼杀青春和梦想的炼狱。更具欺骗性的是，当局还利用各种修正主义谬论来粉饰这种竞争教育的合理性。他们鼓吹“素质教育”口号，却暗地里纵容应试竞争愈演愈烈；他们一方面说要“减负”，一方面又不断加码考试难度，制造选拔压力；他们标榜教育公平，但实际上城乡、阶层差距巨大，穷人子弟寒窗苦读仍难敌权贵子女的起跑线优势。这一切现状都证明，如今中国的教育路线已经彻底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为极少数既得利益服务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它背叛了人民，背叛了社会主义，也将无数青少年推向痛苦的深渊。

悲剧背后的舆论封锁与真相掩盖 化州学生坠楼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和校方并没有汲取教训，反而忙于封锁消息、掩盖真相，企图将这起事件压下去、淡化处理。这再次暴露了修正主义统治者惯用的舆论控制手段：对内严密封锁，对外编造谎言，以维稳为最高准则，哪怕牺牲事实真相和公众知情权。据知情学生在网络上的帖文透露，殷梓辉同学跳楼前曾抛洒揭露涉事老师问题的字条，以期引起大家注意。然而，这些控诉内容很快就被校方和当地官方所收缴和隐藏，相关的帖子和讨论在国内网络上迅速消失。可以想见，化州市教育局和宣传部门在事发后第一时间下令封口：学校师生被要求不得向外泄露半句实情，社交媒体上的消息被以“谣言”名义删除，主流媒体则集体失声。直到有热心网友将情况投稿到境外社交平台，这起悲剧的内幕才得以曝光一角。这种信息管控的严格程度，充分说明当局唯恐公众了解真相，引发对教育体制的质疑。这样的戏码我们已经见过太多。在此之前，全国各地类似的校园惨剧每每发生，官方无不是如法炮制：封锁学校，清理证据，抛出模棱两可的通报，然后压制家属的申诉，将事件迅速遗忘在公众视野之外。例如，今年1月初陕西蒲城县一名职校学生坠楼身亡后，家属发现死者身上有可疑伤痕要求彻查，却屡遭阻挠，结果激起数千民众聚集抗议。当局惊慌失措之下，一方面出动大批警力镇压示威，另一方面严密封锁消息：不仅清空了在场学生手机和手表中的影像记录，甚至将涉事地区名称列为网络敏感词，相关信息在中国互联网上难以搜索到。可见，从学校到地方政府直至更高层，为了维护表面的“和谐稳定”，不惜隐瞒事实、打压言论，以致受害学生的冤情被埋没，罪责难追。



化州事件目前似乎也难逃这样的结局。据当地传出的只言片语，校方和官员正试图将坠楼定性为一起“个人心理问题”导致的自杀，以撇清学校的责任。他们不会承认正是教师和校领导的粗暴行为逼死了学生，更不会承认教育制度本身有任何错误。在官僚们的逻辑里，只要把消息压下去，没有了公众关注，这事就算“平稳处理”了。然而我们要大声质问：难道一条鲜活生命的逝去，就能如此被掩盖和遗忘吗？难道教师的辱骂和体罚不算犯罪吗？难道教育体制的弊病不该曝光、不该改革吗？当权者对真相的封锁，正说明他们害怕人民觉醒，害怕更多人看清制度的问题本质。因此，他们垄断媒体舆论，封堵一切不同声音。这种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比事件本身更让人愤慨。媒体不敢深入报道、维权渠道遭到堵塞，最终只会让校园惨剧一次次重演，让更多无辜的学生成为沉默的牺牲品。我们绝不能容忍这样的舆论压制，必须突破信息封锁，把真相公诸于众，伸张正义，告慰那些逝去的青春。

马列毛主义的指引：只有推翻修正主义，重建社会主义教育 这场悲剧的教训昭示我们：要避免未来再有青年以生命抗议绝望，必须对现行资本主义教育体制进行彻底变革。制度不改，一切悲剧皆难避免。马列毛主义的原理早已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只有彻底铲除滋生压迫的土壤——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反映，推翻当前修正主义当局推行的反动路线，才能建立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指出：“教育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统治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教育，说到底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上层建筑必然反映经济基础，所谓“超阶级的教育”根本不存在。正如宣言所强调的，共产党人并非要取消社会对教育的影响，而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把教育从统治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首先砸碎资产阶级的统治，摧毁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万恶之源。宣言明确宣告：资产阶级关于自由、平等的种种“永恒真理”其实只是以私有制为前提的虚伪说辞，共产主义者承认自己要废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要让劳动群众真正掌握生产资料。只有当劳动不再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教育也才能不再是压迫青少年的工具；只有当私人资本对社会的控制被消灭，才能从根本上救出被统治阶级桎梏的教育。毛泽东主席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高度重视教育方向问题。他早在1958年就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这一光辉思想强调，社会主义的教育应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而不是资本的驯服工具。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更是严厉批判了刘少奇、陆定一鼓吹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指出党内走资派妄图利用旧教育制度培养资本主义接班人，让学校异化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基地。毛主席教导我们：“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这是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在他老人家领导下，当年的教育改革打碎了精英主义的旧框框，工农兵得以上大学，课程改革突出实践和阶级斗争，为无产阶级掌握教育奠定了基础。这一切成功经验证明：只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确保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我们才能培养出敢于斗争、勇于创新的新一代革命事业接班人。反观今日，当局打着“现代化”旗号推行的教育改革，实际上复辟了资本主义的一套破烂，把分数至上、金钱至上的价值观重新奉为主臬。这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公然背叛，也是典型的修正主义倒退。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说，修正主义者总是企图在理论上为资产阶级服务，用“渐进改良”麻痹人民斗志，实质是否定革命、维护私有制度。对于教育，他们用花言巧语掩盖应试奴役的本质，用少数人的升学成功来掩饰大多数人的失败。他们已经彻底证实了毛主席的预见：一旦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教育就会重新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广大学子将被训练成唯命是从的机器，而不是真正全面发展的新人。因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不打破旧教育制度的枷锁，就无法迎来真正的光明。马列毛主义原理启示我们：革命造就新教育。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把资本的统治埋葬，才能谈得上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未来的社会主义教育，应当彻底改变当前这种考试工厂模式，让教育回归“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道路。学校必须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领导管理，教学内容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教育的评价标准不再是冷冰冰的分数排名，而是学生的实际本领和品德贡献。我们要培养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让每个孩子都能发挥所长、健康成长，而不是被应试压力折磨得抑郁痛苦。简而言之，只有重建真正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让无产阶级思想占领教育阵地，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像殷梓辉同学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

宣言：团结奋斗，向反动教育制度宣战 化州坠楼事件以血的代价向全社会敲响了警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再也无法对当前畸形反动的教育体制逆来顺受、默默忍耐了。每一个有良知的学生、青年、教师、家长以及所有劳动人民，都应该被这惨痛的一幕所震醒，认清压在我们头顶的究竟是怎样一座大山。让我们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当教育不再是教育，而变成压迫的时候，反抗就是正义的选择。广大青年学生不应再沉默，在课堂上我们有权批判老师的不公，在校园里我们有权拒绝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教师队伍中的觉悟者也应当站出来，拒绝充当应试体制的帮凶，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为真正的教育理想而奋起。家长们更要反思自身，不要再被分数和排名迷惑，要联合起来向校方和教育当局提出抗议：我们的孩子不是赚钱的机器，不是你们政绩的工具！我们要求减负，要人性化教育，要尊重每个孩子的尊严和梦想。当前的教育制度和社会压迫从根本上说是统治阶级强加的枷锁。学生、教师、家长与工人、农民、本质上处于同一条被压迫战线。我们必须打破各自为战的局面，汇聚起反抗压迫教育的统一战线。建立独立的学生组织、教师团结联盟，联系进步的家长团体，共同揭露教育弊政、声讨官僚黑手。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空间发声，必要时以集体行动表达诉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统治者从不给予恩赐，进步只能通过斗争来赢得。当年“五四运动”的青年学子用热血推动了新文化和革命的先声；今天的新一代更应继承这种光荣传统，把对不公教育的抗争融入争取社会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去。让我们高举马列毛主义的旗帜，以阶级斗争的锋芒投向教育战线的顽敌！当千百万觉醒了的人民群众一起发出怒吼，反动当局的谎言和高墙将不攻自破。我们要让统治者明白：再不改变压迫教育的现状，必将面对更大规模的人民反抗！广大青年学生是国家的未来，但绝不属于任何资产阶级和官僚的囊中之物。如果现行制度剥夺我们受教育的权利、毁灭我们的青春，我们就有权利砸烂这个旧世界！苦难孕育反抗，绝望点燃希望。每一桩悲剧都在呼唤着新世界的诞生。让化州殉难的同学做我们革命的号角吧！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团结起来，把愤怒燃烧为改天换地的激情。只有推翻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才能救出亿万青少年于水火；只有重建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迎来教育的春天，才能让每一个孩子的笑颜在蓝天下自由绽放。让我们团结战斗，高呼着：“打倒资本主义的应试教育！还我无产阶级的红色教育！”为了不再有明天的少年选择跳楼自尽，我们别无他途，唯有奋起反抗，把这吃人的旧制度送进历史的坟墓。革命的未来属于青年，新的教育属于人民！勇敢的同志们，让我们携手前进，在马列毛主义指引下，迎接一个没有压迫、没有绝望的新天地！



论共革阵

一、导言：必须开展对共革阵的系统斗争

近年来，在国内外中文左翼舆论阵地中，“共产主义革命阵线”（以下简称“共革阵”）以高调姿态打出“列宁主义”的旗号，试图塑造其“理论先锋”形象。然而，通过深入分析其文章立场、组织行为以及外围传播体系，特别是与之紧密相关的Telegram频道“网左犯蠢纪念堂”，我们发现：这一组织不仅严重背离马列毛主义基本路线，且在组织作风上表现出宗派主义、托派化和流氓政治的高度结合。更恶劣的是，其支持者甚至公开发表“反串计划”的恶意声明，赤裸裸地宣称其目的是制造分裂、诬陷同志，其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理论争鸣的范畴，堪称一种反革命的心理战与舆论投毒行为。

本文将站在坚定的马列毛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立场出发，结合经典理论、历史经验与近期事实材料，从理论路线、组织作风、政治行为、阶级基础等方面系统批判共革阵及其外围支持者的错误与危害。文章不仅剖析其与托派高度重合的机会主义倾向，也揭露其对革命群众、特别是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阶级歪曲分析，以及其彻头彻尾的阴谋论式操作。

我们明确指出：共革阵并不代表马列毛主义者的革命先锋队，其“反大群”立场也不是出于对错误路线的纠正，而是以“左”的机会主义形式试图占据话语权与政治高地。他们是在用另一种机会主义去批判机会主义，用分裂主义手段掩盖自己理论的破产。我们将坚决揭示其假“左”真右的政治实质，重申正确的革命道路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依靠群众路线、发动人民群众，绝非靠网络圈子与传单幻想。

接下来，我们将从共革阵的理论路线入手，揭示其从“批判大群”出发到迅速向托派滑坡的全过程。



二、共革阵理论路线蜕变与托派化分析

共革阵的理论演化轨迹清晰地表现出一个由“极左批判”滑向彻底托派化的过程。从创始起，其一系列核心文章便开始系统性地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立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阶段性、新民主主义路线、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乃至对文化大革命本身的性质，均作出严重歪曲甚至敌对性解构。

共革阵在多个场合将文化大革命贬斥为“群众受鼓动后的混乱”、“党内激烈权斗的产物”、“一场没有组织、没有战略方向的动乱”，完全脱离毛泽东对文革“继续革命”的基本定义。他们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否认文革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革命，更否认群众组织（如红卫兵、造反派）是斗争的主体力量。其核心立场直接借用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官僚主义革命”话语——将文化大革命视为“官僚之间的斗争转嫁给群众”的操作，而不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为打倒走资派、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斗争。

这与毛泽东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明确指出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妄图复辟，存在国内外的资本主义影响。”是完全相悖的。毛泽东发动文革，正是为了防止党和国家权力结构蜕化、走资派复辟，而共革阵却将这一伟大的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污蔑为“党内斗争的外溢”，这一立场恰恰与托派、自由派和资产阶级舆论遥相呼应。

此外，共革阵在其若干“历史问题探讨”中，还多次援引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历史资料，对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全盘否定。他们攻击苏联在集体化、工业化、反对托派和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的一切成就，转而鼓吹“工人自治”、“工人民主”、反对“官僚国家资本主义”，用以掩盖其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敌意。这类语言与“工人主义”潮流中的新托派几无二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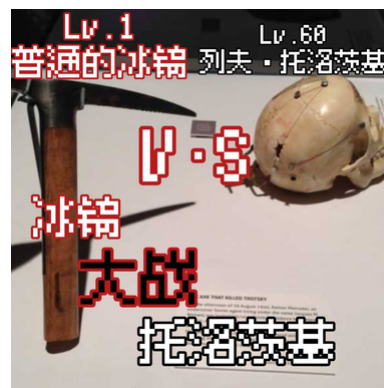


最为严重的是，在其内部文件与支持者言论中，共革阵还开始系统性地用托派视角审视当代中国，得出“中国目前依旧是一个工人国家”“党内斗争仍然可以产生社会主义契机”这样荒谬结论。这种逻辑不仅否定了当代中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实质，也从根本上放弃了“重新发动人民战争、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战略。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更是显而易见。在题为《逝世49周年——毛泽东思想评析》的文章中，他们以“重新评价”为名，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功能化，强调“经验吸取”和“错误教训”，却始终回避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群众路线、继续革命、反修防修。他们批评“毛左”的个人崇拜，却并非真正反对偶像化，而是以此为口实，抽空毛泽东革命理论的精髓。他们不再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一切依靠群众”“造反有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是回避这些阶级斗争实质，转向抽象的“民主”“再建组织”等托式语言体系。他们鼓吹“批判文革的失败经验”，实际上是用失败掩盖伟大，用策略问题否定方向正确。

简言之，共革阵在理论层面早已背离马列毛主义。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信仰阶级斗争，不相信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认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略。他们信奉托派的“不断革命”而非毛主席关于革命阶段论的科学分期；他们呼唤的是“新党”、“工人民主”而非人民战争与群众武装。他们的语言中没有阶级分析，只有抽象的革命想象；他们的策略中没有实地调查与群众路线，只有脱离实际的空喊与“再组织”的幻想。

我们必须毫不妥协地指出：共革阵不是处在“偏离”或“错误”上需要修正的同志队伍，而是在根本方向、路线、目标、理论、群众立场等每一个决定性问题上，彻底地与马列毛主义决裂了。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是新托派与“泛毛派”之间的灰色地带产物，是宗派主义、小资产阶级急躁冒险主义的集合体。他们的存在，是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扰乱与破坏。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揭露他们在组织作风上的宗派主义与政治流氓行为，说明他们的实际运作方式如何彻底背离毛泽东关于党风、群众监督、思想斗争的基本原则。



三、拒绝斗争与组织宗派主义批判：从一次亲身经历谈起

一位同志于2025年9月前后撰写了几篇批判共革阵的文章，尝试就其路线错误、对文革的否定、托派化立场等问题展开理论讨论。原本希望这能促使他们进行公开回应与自我反思，结果是我们被拉黑、被踢群、在Telegram遭到公开挂人，并被其外围粉丝匿名羞辱和侮辱。我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关于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解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关于党的建设方针——都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回应，取而代之的是冷处理、扭曲动机、压制批评。

这种作风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懒惰，更是一种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他们高举“组织纪律”之旗，实则把一切理论质疑视为“破坏”“搞事”“引战”；他们对外高喊要“重建共产党”，内部却以帮派逻辑排斥一切不听命于“核心”的同志；他们组织群完全没有路线斗争、理论整风、群众监督的机制，只有上对下的发布和强制执行。连“组织”都谈不上，只是一堆人围绕几个自我标榜“先进”的话语中心展开附庸。

列宁早就指出：“没有思想斗争就没有生命，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毛主席也说：“要实行开门整风，要相信群众，要相信党内大多数同志。怕群众，怕暴露思想，怕讲错话，结果就会犯错误，犯更大的错误。”共革阵的这种组织文化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式的维稳逻辑，害怕群众、害怕讨论、害怕自己理论被检验。

关于真理报：

我们是中国的一个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组织，于2024年7月4日在浙江杭州成立，我们的目标就是打倒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组织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我们的官网：

<https://emancipationoflabour.wordpress.com/>

我们的纸飞机频道：

<https://t.me/CPCMarxismLeninism>

有意者可通过官网来申请加入我们（一旦审核通过，便会成为我们的成员）或者订阅我们的报纸

投稿邮箱：cpcmlofficial@gmail.com

联系邮箱：CPCMLOfficial@proton.me

他们的支持者所创立的Telegram频道“网左犯蠢纪念馆”，也完全体现了这一流氓无产阶级风格。该频道管理者通过匿名挂人、截图、断章取义、施加网络暴力等方式，试图以“曝光”为名惩罚任何对共革阵表达过批评的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与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群众的行为毫无共同之处。毛主席从未鼓励无原则的谩骂与栽赃，更不支持打击对革命持不同理解的同志。相反，毛强调的是：“是非问题要在群众中通过辩论来解决，而不是靠压服、压制、挂人。”

更令人震惊的是，共革阵在美国街头散发中文传单，其成员在被人质疑为何用中文向美国人“宣传”时，辩称称是为了“动员海外留学生”。但他们忘记了，海外留学生与海外华人阶层绝非他们想象的天然革命力量。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54.45万，其中自费留学生接近50万人，占比超过91%。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出国留学人员来自较富裕家庭，具有明显的小资乃至资产阶级背景。至于旅美华人社区，不少人经营餐馆、小店等小生意，或在当地社会谋生存，本身融入资本主义体系，阶级属性上属于小资产阶级或被边缘化的流动人口。无论是富家子弟式的留学生，还是异国他乡谋生的华人，和中国本土的工人农民大众都存在客观上的隔膜。他们既不直接遭受中国本土资本家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也缺乏参与国内阶级斗争的切身利益和条件。指望这样一支与国内工农割裂的群体去充当中国革命的主力，无疑是缘木求鱼。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革命是群众的事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共革阵根本不分析群众结构，不进行阶级调查，只在想象中制造“潜在受众”，以自嘲式宣传维系其虚假的国际影响力。他们既不了解海外华人处境，也未与真正的海外工人、劳动者、移民底层建立任何联系。他们的所谓“动员”，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自恋表演，是一种空喊式、摆拍式的“革命姿态”。

我们再次强调：共革阵的组织行为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其小资产阶级托派立场在组织形式上的自然延伸。他们根本不相信群众，不进行阶级分析，不接受批评监督，不实行组织民主。他们搞的是圈子政治、宗派排斥、教主崇拜，完全脱离了列宁主义建党的基本原则。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深入分析共革阵外围行为人的政治风格，揭露“网左犯蠢纪念馆”频道的恶劣作用，并对其在国际主义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做出系统回应。



四、“网左犯蠢纪念馆”频道与网络流氓行为的政治反映

共革阵的支持者所创立的Telegram频道“网左犯蠢纪念馆”，是其宗派政治和官僚控制逻辑在社交媒体上的极端表现。该频道声称“宣传毛主义”，实际上却成为共革阵领导人及其拥趸操纵网络斗争、发泄政治攻击、制造舆论恐怖的工具。在频道运营者发布的自述中（《为什么创建这个频道——我的反串计划和目标》），其明确承认此频道目的是“反串破坏”“混淆视听”“揭露反串者”——这是以一种近乎精神分裂的方式，将本该清晰的政治斗争完全扭曲为私人报复与匿名惩戒。

这一频道的实际运作方式，是匿名化挂人、歪曲发言、恶意截图、蓄意断章取义，并配合共革阵核心人员在各小群体内散播攻击性言论，形成网络舆论合围。许多遭到攻击的同志，仅仅因为在某次讨论中表达了对共革阵的批评，或仅仅因为质疑了其组织运作逻辑，便遭到该频道长期挂人式骚扰。这种做法与真正革命者应当持有的政治操守和斗争风格格格不入，反而更像是民粹网络暴力和数字政治迫害的翻版。

毛泽东曾指出：“斗争的目的是分清路线，是团结大多数，不是打击一切。”而“网左犯蠢纪念馆”的做法，却是主动制造敌人、扩大裂痕、刺激仇恨情绪，将一个本可用于政治宣传的空间变成了数字清洗与猎巫场所。这种政治风格实质上不是马列毛主义，而是极端小资产阶级恐慌心理的表现——对批评的焦虑，对权威的固守，对群众话语的深刻敌意。

该频道的创建者甚至在其文章中透露其“反串行动”本质是一场伪装计划，即以制造伪装身份来钓鱼式揭露他人、反向控制舆论。这种操作彻底抛弃了公开讨论与政治说理，而是以阴谋论与间谍逻辑统摄一切人际关系。这背后体现的，是对群众路线的极端蔑视与对无产阶级民主机制的严重敌对。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是坦率和公开的斗争。”无论是党内分歧还是群众讨论，都必须建立在公开论战、共同提高的基础上。而共革阵及其频道“共产主义者”采取的恰恰是资产阶级秘密政治的全部逻辑——私信举报、匿名诬陷、施压删除、封杀言论。

我们必须向一切真正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同志揭示这种手法的本质：这不是革命风格，而是“左”的恐怖主义；这不是政治批判，而是数字网暴；这不是组织斗争，而是宗派清洗。他们在政治路线上已陷入托派迷思，在组织风格上则演化为极端教派主义，在群众路线层面则完全破产。

下一部分，我们将揭示共革阵在“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这一问题上的模糊与逃避，以及他们如何在重大现实判断问题上不断回避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导致整个路线彻底脱离实际。



五、“反机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共革阵对“大群”的虚伪批判

我们早已敏锐察觉到，共革阵对“大群”的否定，并非建立在正确路线斗争的基础上，而是出于宗派目的。他们并不真正分析“大群”的阶级立场、组织逻辑、历史形成，而是把“大群”当作他们上升为“新权威”的垫脚石。他们用“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掩盖自身理论空洞，用“组织纪律”的表象掩盖对群众的压制。

在批判大群的文章中，共革阵大量使用了“阶级混杂”“缺乏纪律”“低水平重复”等语言，却并未指出：大群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回避继续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两条道路斗争逻辑。他们更未指出，大群中“毛左泛改良主义”的实质是将毛泽东思想抽象化、变成文化标签、精神偶像，而非政治纲领、群众路线与革命路线。共革阵以这种不彻底的“反机会主义”姿态，反而掩盖了自身的机会主义本质。他们在语言上比大群更左，在理论上却没有走得更远。他们否定大群的“大众化宣传”，自己却鼓吹“对先进分子的培养”；他们批判大群的“发泄式批判”，自己却依赖匿名挂人；他们否定大群的“改良主义”，自己却从未提出任何革命战略、武装道路、阶级联盟的基本蓝图。他们的“革命”，从未走出讨论群、匿名账号与几份传单的狭小空间。

我们必须揭露他们的真正逻辑：不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错误，而是为了确立“自身正确”的神坛地位，不择手段压制他人。列宁在《怎么办？》中指出：“斗争的胜利不在于否定对手的存在，而在于提出一个更高的纲领、更明确的路线和更有战斗力的组织形态。”共革阵做不到。他们打碎了大群，却没给群众提供任何替代组织；他们拆解了泛左叙事，却无法在阶级分析与群众路线中构建新框架；他们搞的是破坏，不是建设，是消极批判，而非革命推进。

六、在重大现实判断上逃避立场：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

任何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在分析当代中国问题时，首要任务之一便是做出清晰的阶级与国家性质判断。这不是纯理论争辩，而是决定一切策略、路线与组织形式的根本依据。而共革阵在“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这一问题上，始终回避明确表态，刻意模糊视角，以“避免陷入路线之争”为借口规避立场。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破坏。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国家的经济基础与阶级统治本质，而不是用“含糊其辞”“历史未定”的模糊语言来推脱责任。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明确定义：“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金融资本统治、资本输出居主导、瓜分世界市场和殖民地的阶段，就进入帝国主义。”

按照这一标准，当代中国完全符合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结构：

- 拥有巨大的国家资本与金融资本集团（如国有银行、华为、阿里、央企等），操纵市场并对内外施行统治；
- 大规模对外资本输出，以“一带一路”、中资并购、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为表现；
- 在全球市场中与美欧日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竞争瓜分利润与资源；
- 对内高压统治工人阶级，对外援引民族主义扩张逻辑，成为压迫其他国家工人的区域强权。

正是因为当代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所以任何真正革命者，都必须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共官僚资产阶级政权，而不是幻想“国家仍具有半殖民性质”或“国家机器可为工人所用”。共革阵在理论上迟迟不做出判断，在组织中对提出“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立场的同志进行压制与排斥，实质上是在保留对中共的某种模糊幻想，是对“特色帝国主义”的投降。

毛主席在晚年多次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并在文革中提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早已不是“未完成”的预警，而是对今天现实的精准揭示。今日的中国不但复辟成功，而且蜕变为独立的帝国主义中心之一，其工人群众受到剥削，其海外政策具有资本掠夺与国家强压双重属性，这一事实，任何有良知的革命者都不能回避。

共革阵的模糊主义和回避主义，实际上正暴露其理路线的保守性。他们口头上反大群，反修正主义，反托派，但在战略判断这一核心问题上，却与泛毛派、泛左翼、改良主义如出一辙：都不愿承认中共政权本身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专政的代表。他们要么将“帝国主义”仅作为美国的专利，要么装作中国尚在民族解放阶段，要么用“尚未完成社会主义任务”的说辞来延续幻想。

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路线空白”的伪中立主义，正如列宁所说：“最坏的机会主义者，常常是以‘两边不站’的姿态出现的。”

下一部分，我们将总结共革阵现象所代表的当代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潮流，指出斗争方向必须回到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组织建设、人民战争路线与群众组织战略上来。

结语：必须回到真正的马列毛主义出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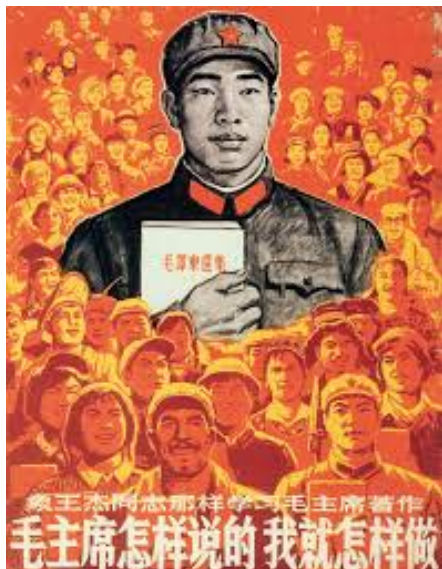
共革阵这一现象，是当代激进左翼小资产阶级在组织化破产、理论路线模糊背景下自我幻觉的集中体现。他们将语言激进化视为理论彻底化，将组织封闭性当作政治统一，将匿名斗争包装成“革命纪律”，将群众的批评视为“渗透”“反串”，将网络挂人、美化自己、攻击他人作为组织建设的一部分。

他们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注定的。他们在政治上违背群众路线，在理论上脱离继续革命，在组织上背弃民主集中制，在路线判断上回避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根本认识。他们是“左”的形式主义，是“反机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是“反修正主义”的托派变种。他们不是马列毛主义者，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种子，而是新一轮政治教派主义浪潮中的一朵泡沫。

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从这样的虚假激进主义中彻底划清界限。我们要回到毛主席指出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原则，要回到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中的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组织民主三位一体的构建方式，要回到马恩的“革命实践即揭露和推翻一切现存秩序”的批判传统，要回到武装斗争与群众组织的结合点上来开展阶级斗争。

今天，马列毛主义的任务，是重建群众信任、恢复群众政治意识、发展真正扎根于工人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中的先锋力量。我们必须在中国帝国主义的背景下，重构革命战略，揭露一切假左、伪左、小资左、挂羊头卖狗肉的组织和潮流。

我们不需要“左”的托派宣传机器，不需要流氓式网络挂人，不需要空洞的词句堆砌，我们需要的是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战斗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共革阵不是道路的一部分，而是障碍。只有越过它，才能走向真正的胜利。



在2025年12月26日，庆祝菲律宾共产党成立第57周年！

云水怒小组



在2025年12月26日，庆祝菲律宾共产党成立第57周年！

菲律宾共产党在1968年12月26日成立，在1969年3月29日，同的虎克军武装一同组建新人民军，发起“持久人民战争”。1973年4月24日，党领导成立菲律宾全国民主阵线。自1968年重新建党开展人民战争事业以来，党已经走过了57个春秋了。

菲律宾在当代受到美帝国主义和中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剥削。中国与美国的过剩资本共同向菲律宾倾销，中国在西菲律宾海建立了至少七个军事设施，而美国的则更多。菲律宾当局小马科斯政权受到美帝与中帝的直接支持，在2023年1月4日，中帝头子习近平还亲赴菲律宾向小马科斯进行“慰问”。菲律宾共产党在反对美帝的同时，也在反对中帝。菲律宾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斗争中的菲律宾人民之友”设立了中文的翻译委员会，菲律宾共产党首席信息员马可·L·瓦尔布埃纳于2022年4月20日为《菲律宾共产党开展革命五十年来伟大成就》中译本所作的序言中写道：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工农大众正在全国各地自发地开展群众斗争。我们坚信，通过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不懈努力，中国革命无产阶级终将成功地在中国人民面前揭露修正主义政党，建立一个能够领导中国人民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新共产党。

我们希望面前的这份译本能成为中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日益壮大的运动的一部分，以便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在中国开展革命斗争。

菲律宾的人民战争正在不断推进。在2025年12月22日，菲律宾共产党党刊《人民》报道：“新人民军北内格罗斯司令部（罗塞林·让·佩莱司令部）报告称，该部队从一名警察的智能手机中获取了菲律宾国家警察（PNP）在北内格罗斯地区的情报网络信息。……（新人民军）已经掌握了覆盖埃斯卡兰特市、托博索和卡拉特拉瓦的警察反游击情报网络的完整信息。通过这些信息，新人民军单位已经查明了关键警察特工的秘密资料以及所有受雇情报人员的名单。”在2025年12月25日，党宣布将停火4日，以便群众庆祝圣诞节与党成立57周年的纪念日，同时命令新人民军各部门保持防御态势，警惕敌人。

我们呼吁在毛主席诞辰132周年纪念日之时，一同欢庆菲律宾共产党成立第57周年。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当前同群众脱离的状态，认清中国革命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性质，并展开新的革命实践，探索并推进群众工作。

云水怒小组于2025年12月26日

来源：“云水怒”小组

<https://t.me/Yunshuinu/97>

民族民主阵线团体在马尼拉游行，纪念菲共成立57周年

菲律宾共产党信息局

民族民主阵线团体在马尼拉游行，纪念菲共成立57周年

菲律宾共产党信息局，2025年12月22日，

12月21日，隶属于民族民主阵线（NDF）的各盟员组织的百余名成员，在马尼拉阿韦尼达（Avenida）繁忙的街道上举行游行，以纪念即将到来的12月26日菲律宾共产党成立57周年。该地区警察的部署并未能阻止这场抗议游行。

参加抗议活动的有“爱国青年”（Kabataang Makabayan，青年组织）、“人民艺术家和作家协会”（Artista at Manunulat ng Sambayanan，艺术家和记者组织）、“工会革命委员会”（Revolutionary Council of Trade Unions，工人团体）、“爱国菲律宾职员协会”（Makabayang Kawang Pilipino，政府雇员组织）以及“同胞”（Compatriots，菲律宾移民工人组织）的成员。他们手持旗帜和标语牌，号召菲律宾人民加入民族民主革命，并站出来反对他们所谴责的费迪南德·马科斯二世政府统治下的腐败和法西斯国家。

这些团体号召青年加入由新人民军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并断言现政权下广泛的系统性腐败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只有通过推翻国家机器才能得到解决。

在游行前的几天里，隶属于民族民主阵线的团体在整个马尼拉大都会区开展了一系列活动。12月17日，他们在迪利曼菲律宾大学的提灯游行（Lantern Parade）期间举行了抗议集会。类似的倡议——包括带有呼吁庆祝菲共周年纪念、支持新人民军以及纪念菲共创始主席何塞·玛丽亚·西松逝世周年的涂鸦艺术——出现在该地区的不同地方。

菲律宾共产党首席信息官马科·瓦尔布埃纳（Marco Valbuena）赞扬了这些行动，他称这些行动是“革命活动重新焕发活力的明确迹象，不仅在国家首都，而且在全国各地”。他补充说，这是党在2023年12月发起的持续整风运动的“不容置疑的积极成果”。

“革命地下组织的这些活动有助于激励人民推进人民战争，随着广大群众寻求解决腐败和法西斯政权危机的方案，这场战争变得更加紧迫，”瓦尔布埃纳补充道。



来源: 菲律宾共产党信息局

https://t.me/prwc_newsroom/162

雇佣劳动与资本（第一部分）

德国
K·马克思

我们听到了各方面的责难，说我们没有详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我们只是当这些关系在政治冲突中直接表现出来的时候，才有意地提到过这些关系。

过去首先必须从日常历史进程中去考察阶级斗争，并根据已有的和每天新出现的历史材料来从经验上证明：当实现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的工人阶级被征服的时候，它的敌人（在法国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在整个欧洲大陆则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也同时被战胜了；法国“正直的共和国”的胜利，同时也就是以争取独立的英勇战争响应了二月革命的那些民族的失败；最后，随着革命工人的失败，欧洲又落到了过去那种受双重奴役即受英俄两国奴役的地位。巴黎的六月斗争，维也纳的陷落，1848年柏林11月的悲喜剧，波兰、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拚命努力，爱尔兰的严重饥荒——这些就是那些集中表现了欧洲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主要事件。我们曾经根据这些实例证明过：任何一次革命起义，不论它的目的显得离阶级斗争有多么远，在革命的工人阶级没有获得胜利以前，都是不免要失败的；任何一种社会改革，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封建反革命没有在世界战争中用武器进行较量以前，都是要成为空想的。在我们的阐述中，也如在现实中一样，比利时和瑞士都是大历史画中的悲喜剧式的、漫画式的世俗画：前者是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后者是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典型国家，两者都自以为既跟阶级斗争无关，又跟欧洲革命无关。

现在，在我们的读者看到了1848年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后，我们想更切近地考察一下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阶级统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本身，也就适当其时了。

我们分三大部分来加以说明：（1）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的奴役地位，资本家的统治；（2）各个中等资产阶级和所谓的市民等级在现存制度下必然发生的灭亡过程；（3）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在商业上受世界市场霸主英国的奴役和剥削的情形。

我们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我们就当读者连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没有。我们希望工人能明白我们的解说。加之，在德国到处对一些最简单的经济关系的了解都极端无知和十分混乱，从特许的现存制度的辩护者到冒牌的社会主义者和未被承认的政治天才都莫不如此，这种人在四分五裂的德国比“诸侯王爷”还多。

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工资？它是怎样决定的？

假如问工人们：“你们的工资是多少？”那么一个工人回答说：“我做一天工从我的雇主那里得到一马克”；另一个工人回答说：“我得到两马克”，等等。由于他们工作的劳动部门不同，他们每一个人因做了一定的工作（譬如，织成一尺麻布或排好一个印张的字）而从各自的雇主那里得到的货币数量也不同。尽管他们得到的货币数量不同，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工资是资本家为了偿付劳动一定的时间或完成一定的工作而支出的一笔货币。

可见，看起来好像是资本家用货币购买工人的劳动。工人是为了货币而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他们为了货币而向资本家出卖的东西，是他们的劳动力。资本家以一天、一星期、一个月等等为期购买这个劳动力。他在购买劳动力以后使用这个劳动力，也就是让工人在约定的时间内劳动。资本家用以购买工人劳动力的那个货币量，譬如说两马克，也可以买到两磅糖或一定数量的其他某种商品。他用以购买两磅糖的两马克，就是两磅糖的价格。他用以购买12小时的劳动力的使用的两马克，就是12小时劳动的价格。可见，劳动力是一种商品，是和砂糖一模一样的商品。前者是用钟点来计量的，后者是用重量来计量的。

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即劳动力去换得资本家的商品，即换得货币，并且这种交换是按一定的比例进行的。一定量的货币交换一定量的劳动力的使用时间。织布工人的12小时劳动交换两马克。但是，难道这两马克不是代表其他一切可以用两马克买到的商品吗？可见，实质上工人是拿他自己的商品即劳动力交换各种各样的其他商品，并且是按一定的比例交换的。资本家付给他两马克，就是为交换他的工作日而付给了他一定量的肉，一定量的衣服，一定量的劈柴，一定量的灯光，等等。可见，这两马克是表现劳动力同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比例，即表现他的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商品通过货币来估价的交换价值，也就称为商品的价格。所以，工资只是人们通常称之为劳动价格的劳动力的特种名称，是只能存在于人的血肉中的这种特殊商品价格的特种名称。



马克思
雇佣劳动与资本

图为1949年第一版
（三联书店）雇佣
劳动与资本

拿任何一个工人来说，比如拿一个织布工人来说吧。资本家^⑥供给他一台织布机和一些纱。织布工人动手工作，纱变成了布。资本家把布拿去，卖了比方说20马克。织布工人的工资是不是这块布中的一份，20马克中的一份，他的劳动产品中的一份呢？绝对不是。因为这个织布工人是在布还没有卖出以前很久，甚至可能是在布还没有织成以前很久就得到了自己的工资的。可见，资本家支付的这笔工资并不是来自他卖布所赚的那些货币，而是来自他原来储备的货币。资产者给织布工人提供的织布机和纱不是织布工人的产品，同样，织布工人用自己的商品即劳动力^①交换所得的那些商品也不是他的产品。可能有这样的情形：资产者给自己的布找不到一个买主。他出卖布所赚的钱，也许甚至不能捞回他用于开销工资的款项。也有可能他出卖布所得的钱，比他付给织布工人的工资数目大得多。这一切都与织布工人毫不相干。资本家拿自己的一部分现有财产即一部分财产去购买织布工人的劳动力，这就同他拿他的另一部分资本去购买原料（纱）和劳动工具（织布机）完全一样。购买了这些东西（其中包括生产布所必需的劳动力^①）以后，资本家就用只是属于他的原料和劳动工具进行生产。当然，我们这位善良的织布工人现在也属于劳动工具之列，他也像织布机一样在产品中或在产品价格中是没有份的。

所以，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性劳动力的那一部分。

总之，劳动力是一种商品，是由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出卖给资本的一种商品。他为什么出卖它呢？为了生活。可是，劳动力的表现即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表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够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对于他来说，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劳动是已由他出卖给别人的一种商品。因此，他的活动的产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动的目的。工人自己生产的不是他织成的绸缎，不是他从金矿里开采出的黄金，也不是他盖起的高楼大厦。他为自己生产的是工资，而绸缎、黄金、高楼大厦对于他都变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也许是变成棉布上衣，变成铜币，变成某处地窖的住所了。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有12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认为这12小时的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在他看来，12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织布、纺纱、钻孔等等，而在于这是挣钱的方法，挣钱使他吃饭、喝酒、睡觉。如果说蚕儿吐丝作茧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那么它就可算是一个真正的雇佣工人了。

劳动力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奴隶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奴隶主，正如耕牛不是向农民卖工一样。奴隶连同自己的劳动力一次而永远地卖给奴隶的所有者了。奴隶是商品，可以从一个所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所有者手里。奴隶本身是商品，但劳动力却不是他的商品。农奴只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力。不是他从土地所有者方面领得报酬；相反，是土地所有者从他那里收取贡赋。农奴是土地的附属品，替土地所有者生产果实。相反地，自由工人自己出卖自己，并且是零碎地出卖。他每天把自己生命中的8小时、10小时、12小时、15小时拍卖给出钱最多的人，拍卖给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即拍卖给资本家。工人既不属于某个所有者，也不属于土地，但是他每日生命的8小时、10小时、12小时、15小时却属于这些时间的购买者。工人只要愿意，就可以离开雇用他的资本家，而资本家也可以随意辞退工人，只要资本家不能再从工人身上获得利益或者获得预期的利益，他就可以辞退工人。但是，工人是以出卖劳动力为其收入的唯一来源的，如果他不肯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至于工人给自己寻找一个雇主，即在这个资本家阶级中间寻找一个买者，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了。

现在，在更详细地谈论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以前，我们先简短地叙述一下在决定工资时要考虑到的一些最一般的条件。

我们已经说过，工资是一定商品，即劳动力的价格。所以，工资同样也是由那些决定其他一切商品价格的规律决定的。

那么，试问：商品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

二

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

它是由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即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决定的。决定商品价格的竞争是三方面的。

同一种商品，有许多不同的卖者供应。谁以最便宜的价格出卖同一质量的商品，谁就一定战胜其他卖者，从而保证自己有最大的销路。于是，各个卖者彼此间就进行争夺销路、争夺市场的斗争。他们每一个人都想出卖商品，都想尽量多卖，如果可能，都想由他一个人独卖，而把其余的出卖者排挤掉。因此，一个人就要比另一个人卖得便宜些。于是卖者之间就发生了竞争，这种竞争降低他们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

但是买者之间也有竞争，这种竞争反过来提高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

导师语录

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 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 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 敌人的主要武器。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 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 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 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 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 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 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 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 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

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



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 我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 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 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 贻误我们的工作。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 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 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 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